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马尔萨斯传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世界名人传记

马尔萨斯传

X X X 编著

目 录

第一章 马尔萨斯的一生.....	003
从人口问题谈起.....	003
马尔萨斯的一生.....	006
第二章 走运的马尔萨斯.....	010
宠儿——马尔萨斯.....	010
《人口原理》产生的直接缘由.....	014
为什么要写《政治经济学原理》.....	022
第三章 浅薄的小册子.....	025
杜撰了一个“永恒的人口规律”.....	025
马尔萨斯论中国人口问题.....	035
反科学的“人口自然规律”.....	038
第四章 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家.....	047
庸俗的价值理论.....	047
庸俗的收入理论.....	058
第五章 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哈叭狗”...081	
“私有制是最良好的制度”.....	082
“济贫法是一种使国家破产的制度”.....	088
土地贵族的孝子贤孙.....	092
“寄生虫”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100
第六章 牧师与职业剽窃者.....	108

“江湖牧师”	108
职业剽窃者	111
第七章 马尔萨斯的徒子徒孙	116
普雷斯主义	116
现代马尔萨斯主义	118
马尔萨斯的门徒——凯恩斯	124

第一章 马尔萨斯的一生

世界上名人千千万万，出“名”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因新发明、新理论造福于人类而英名远播、流芳百世；有的因地位显耀、政绩卓著、战功赫赫而威震四海、世人敬仰；有的则因暴殄、反动而臭名昭著、遗臭万年，等等，不一而足。本书的主人翁马尔萨斯因为什么而出名呢？让我们先从人口问题谈起吧。

从人口问题谈起

在人类初期，人口非常少，加上当时生产工具十分简陋，且数量非常少，人类维持自己生存的能力极其有限，人口增长十分缓慢。直到大约1万年前，人类进入农业和畜牧业发展阶段以后，才开始了稳定地获得食物的生活，为自己的生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人类利用各种生物物种、耕地、草原和水源等自然资源从事生产，人口得以迅速增长。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工业文明到来以后，世界人口增长更快。人类经过几百万年生育繁衍，到1987年达到了50亿的庞大数目。

世界人口冲破5 0亿大关后，仍像脱僵的野马，继续急剧地增长着。世界人口每分钟增加1 5 0人，每天增加近2 2万人，每年增加约8 0 0 0万人，每1 2年将增加1 2亿人。迅速增长着的人口对地球资源、对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影响。

人类面临着自身增长过快的挑战。人口——这一柄达摩之剑，高高悬在人类头上，随时都有落下来的危险。其原因在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自然资源，如耕地、牧地、林地等土地资源，煤、石油、天然气等石化燃料和各种矿产金属，以及通航河流、水力、风力、瀑布等等。没有这些资源，人类就不可能创造财富，也就不可能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而自然资源是相当有限的，人口越多，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压力也越沉重，同时给自然环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就越大，从而破坏着自然界向人类提供资源和其他方面条件的能力，使人类的生存受到更大的威胁。

人类很早就开始关注人口问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们从各自所处的社会背景、阶级立场出发，对人口问题进行了思考，提出了不同的人口思想。从人口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的口论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进行的；中世纪的人口论是以基督教伦理观点为出发点的；而到了近代，从1 6世纪意大利的波太罗以来，

对人口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从经济学方面进行的。在作为重农主义经济学先驱的康替龙 (RichardCuntillon) 的学说中是这样，在为重商主义经济学说作最后润色的斯图亚特 (JamesSteuart) 也是这样。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 (AdamSmith) 在他的著作之中对人口问题也偶有涉及。到了罗伯特·马尔萨斯出现时，才有了一部专门论述人口理论的著作，并引起了人们注意人口理论的研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开创了系统研究人口理论的先河，他本人也因此成名立万。

但如果我们简单地根据上面的这一句话就马上得出结论说，马尔萨斯的“名”是“英名”，那就像看秤看错了大花一样，大错特错了。马尔萨斯究竟是什么样的名人呢？从现象上看，我们可以这样说，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ThomasRobertMalthus, 1766-1834)，是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人口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家的主要代表，东印度学院的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英国教会的牧师。而从本质上看，则只能这样说，马尔萨斯是既保守又反动的资本家和土地贵族的辩护士。马克思在他的《剩余价值论》中曾这样地评价马尔萨斯：“马尔萨斯的特点，是思想极端卑鄙，——只有牧师才可能这样卑鄙，他把人间的贫困看作对罪恶的惩罚，而且

在他看来，非有一个‘悲惨的尘世’不行，但是同时，他考虑到他所领取的牧师俸禄，借助于关于命运的教义，认为使统治阶级在这个悲惨的尘世上愉快起来，对他是极为有利的。这种思想的卑鄙还表现在马尔萨斯的科学工作上。第一，表现在他无耻的熟练的剽窃艺术上；第二，表现在从科学的前提做出的那些看人眼色的而不是毫无顾忌的结论上。”

马尔萨斯的一生

尽管马尔萨斯生活在英国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但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也可以说是风光十足的，没有像世界上许多知名人士那样饱受了一番痛苦、挫折和磨难。

马尔萨斯1766年2月出生于英国土地贵族家庭，他的祖先有的担任皇家的医生，有的当过牧师、军官，他们在当时统治阶级的圈子里是颇有一些名望的。他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Daniel Malthus, 1730 - 1800)在牛津大学学习过，对植物学和艺术有特殊的爱好，知识比较渊博，但在事业上一事无成，靠祖先留下来的资产过着绅士生活。由于家庭原因，马尔萨斯从小就有着优越舒适的生活条件，并受

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按英国财产继承法，不是长子的马尔萨斯不能继承和享受其贵族家庭的遗产。这样，老马尔萨斯只好给他安排另外一条人生道路，即加入僧籍，从事教育。老马尔萨斯十分关心马尔萨斯的成长和前途，总是尽力给他以各方面的教育。当马尔萨斯刚刚满两岁，老马尔萨斯就按照英国上层社会的习惯，专门聘请了家庭老师对马尔萨斯进行多方面的培养和教育。

马尔萨斯在其父亲的关怀下，很快就顺利地完成了小学(在格拉佛斯小学)和中学(在威克菲尔德中学)的全部学业。1784年他19岁时跨进了大学的校门，在剑桥大学神学院专门攻读哲学和神学。大学期间，马尔萨斯学习比较刻苦，成绩很好，是剑桥大学第九次数学优等生。他24岁时(1788年)大学毕业，毕业后，在家里呆过一段时间后，又再次到剑桥大学继续从事研究，并于1791年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1798年，马尔萨斯在他家乡萨立州的奥尔堡担任教堂的牧师、教长。同年他匿名发表了《人口原理》一书。由于这本小册子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受到土地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的青睐和宠爱，因而使马尔萨斯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荣誉”，马尔萨斯为自己出乎意料的成功感到万分的惊奇。

1799年马尔萨斯花了5年时间，游历了德意

志、瑞典、挪威、芬兰和俄罗斯诸国，继续研究人口问题。与此同时，他又开始了对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并于1800年发表了《当前粮食涨价原因的研究》一文。该文发表不到一个月，他就受到了当时英国首相小威廉·庇特的接见。马尔萨斯“红”极一时。

马尔萨斯享此“殊荣”之后，更坚定了他为反动统治阶级效劳的立场和决心。在《人口原理》问世5年后的1803年，马尔萨斯用真名发表了《人口原理》第二版。1804年，他接受了东印度公司的聘书，在伦敦附近的海里堡东印度学院担任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这是英国设立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

从1805年起，马尔萨斯一直在东印度学院教书，兢兢业业地灌输他的反动理论，直到1834年69岁时因心脏病去世。在此期间，马尔萨斯除了从事教学外，还不断致力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当时，英国工业资本和土地贵族所有权之间发生的利益冲突，在谷物法问题上公开爆发出来，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马尔萨斯为此先后推出了一些经济学论文和著作，为土地贵族辩护。主要有《因怀特海提出修改救贫法建议案给怀特海的信》（1807年）；《谷物条例的后果以及谷物价格涨落对于农业和国家总财富的影响的考察》（1814年）；《地租的性质与发展》（1815

年)；《对限制外国粮食进口政策的一个意见的论据，论谷物条例一书的补充》(1815年)；《有关东印度学院的演说，用事实驳斥近年来在所有法庭上对它的指责》(1817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价值的尺度》(1823年)；《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其中《政治经济学原理》是马尔萨斯另一代表作。

第二章 走运的马尔萨斯

宠儿——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因发表《人口原理》而一举成名。他的“走运”并非偶然，而是有其社会历史根源的。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第一版开端就说，他是由于法国革命引起政治争论而提出人口问题的。这就是说，这本书的主旨最初并不是在于研究人口原理，而是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马尔萨斯之所以走运，就是因为他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和任何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一样，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就是当时西欧的经济、政治、思想发展的产物。

马尔萨斯生活的年代，18世纪末的英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政治、经济、思想发生革命变革的时期。首先是农业革命对农民进行无情的剥夺。英国在西欧是资本主义生产先进的国家。14世纪到15世纪英国工场手工业已经产生。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英国就开始了通过剥夺广大农民土地来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到18世纪末，英国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又称“羊吃人”运动）达到了高潮。广大

农民不断地被赶出家园，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自从“圈地运动”盛行起来后，丧失土地的农民大量增加，因而出现了“人口过剩”的现象。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在牺牲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其次工业革命(又称产业革命)促进了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技术基础，使英国经济空前高涨起来。由此引起的后果是：一方面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资本家竞争的结果，小生产者破产，沦为无产者；再一方面，由于工厂的建立和机器的使用，大量排挤工人，以致失业人数大增，工资下降，工人健康状况恶化，出现了“人口过剩”的现象，越来越多的雇佣劳动者成为“多余”的人，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农民被剥夺土地，手工业者破产，工人大批失业，劳动群众的生活日益恶化，使英国社会矛盾更加尖锐起来，反抗运动遍及英国各地。1795、1816年和1830年先后发生粮食骚动。在机器工业出现的初期，工人反对机器的斗争也风起云涌。尽管工人群众的反抗遭到镇压，甚至在1769年国会通过法令，宣布以死刑惩治破坏机器和工厂的工人，但破坏机器的斗争仍然是彼伏此起，到19世纪初期，这种破坏机器的暴动遍及英国各地。如1769年布列克伯恩的工人捣毁工厂的纺纱机，1779年兰开夏的

工人也开展过破坏机器的斗争，参加人数达 8 万之多。与此同时，农村中农民抗拒圈地法案的斗争也很激烈，拆除圈地的栅栏，反对官吏的斗争遍及各地，整个英国处于沸腾之中。

再次，正当英国处于沸腾状态之际，1789 年法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爆发了。法国革命的消息传到英国后，英国劳动群众的斗争热情更加高涨，有产阶级疑虑法国革命蔓延到英国的可能性，日益惶恐不安。

拿破仑战争期间及战争结束后，城市贫民的经济生活就一直趋于恶化。在长期的战争年代，英国是相对繁荣的，战争结束后呈现萧条的景象。这时，普遍的失业问题和粮食高价格问题进一步威胁着劳动人民的生存。而粮食高价格又与“谷物条例”有关。英国的“谷物条例”自重商主义时代就存在了，它企图通过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制度来稳定谷物的高价格，以确保地主阶级的利益。在丰收年代，谷物价格跌落，进口税有力地阻止谷物进口；在歉收年代，价格上涨，则适度降低进口关税。在这个制度下，从 1795 年到 1812 年英国的谷物进口实际上是免税的，谷物条例不起作用，因为人口持续增长，加上战争期间对盟国的支援，谷物价格上涨不已。当战争结束和平到来时，谷物的大量进口，威胁着土地贵族的利益，遂

于1815年重新制定“谷物条例”，阻止谷物进口。在长期的粮食高价格下，贫民问题引起济贫问题；从济贫问题导致“救贫法”的争执，思想界发生了巨大的动荡。

贫富悬殊的社会背景，加上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英国开展了激烈的社会改革运动，出现了批判私有制著作，葛德文(William Godwin, 1756-1863)的《政治正义论》、《研究者》。这些思想的传播愈使人心动荡不安，英国的保守集团和稳健的自由派惊慌失措，寝食不安。甚至那些过去欣赏18世纪激进思想的人，也由于雅各宾主义的凯歌猛进而胆战心惊。英国统治者生怕国内无产阶级起来革命，自己会像法国国王一样被送上断头台去绞首。为了转移国内劳动群众斗争视线，消除法国革命对英国的威胁，1793年英国政府发动了对法国的战争。在对外战争的借口下，1794年英国政府颁布禁止集会的法令，宣布民主组织为非法，大量逮捕民主运动和群众运动领袖，对国内劳动群众实行血腥镇压。但是由于战争使英国财政和经济愈益困难，人民群众的生活进一步恶化。在整个战争年代里，英国仍接连不断地发生示威、罢工、暴动、粮食骚动、水兵起义等事件。在此内外交困的时候，怎样压制群众反抗，如何看待和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成为英国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英国统

治者迫不及待地筹谋对策，制造反革命舆论和谋求反革命宣传的理论武器，以抵制法国革命的影响，为失业和贫困现象辩护，借此来欺骗和麻痹无产阶级，松懈人民在革命运动中的斗志。正当英国统治者一筹莫展的时候，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如同“天降甘露”，正中统治者的下怀。

《人口原理》产生的直接缘由

要了解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产生的直接缘由，先必须交待当时在英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宣传革命的著作。在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中，法国改革论者马里·让·孔多塞（1743 - 1794），1793年10月以缺席审判被判处死刑。但他并没有离开巴黎，而是避开了激进党的追捕，受一妇女庇护，匿居其家8个多月，在此期间写出了被称为世纪的遗书《人类的精神进步史》（有的译为《关于人心进步的历史考察》）一书。他从社会进化出发，主张人类精神的进化促进人类的进化。他认为社会的不平等和人民的贫困是人类理性的缺陷和私有制造成的，必须废除私有制，改革这种社会制度。1794年4月5日，孔多塞在离开这一妇女家外出时被捕，3天后被

发现在狱中自杀身亡。孔多塞的戏剧般的《爱与死的诙谐》的遗稿，同年在巴黎出版，1795年又再版。这本著作于1795年被译成英文，流传到英国。于是法国革命的气息席卷了整个欧洲。

但在革命前惊慌万状的英国政府，一方面镇压全国的激进主义者，一方面禁止发行孔多塞的著作，甚至不问缘由就处以刑罚。而1793年公开发行的英国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 1756-1863）所著的《论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简称《政治正义论》）一书，由于书价很高，被认为工人不会购买而得到了英国政府的默许。不料工人集资合购，争相传阅。葛德文的著作对知识分子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研究简直一无用处，争着去读葛德文的著作。一些大学教授公开对学生说：“把化学的书烧掉，去读葛德文的必然论罢！”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在当时是一本赞美革命、人皆信仰的书，也被当时的反动者看作“造出欧洲各国一个感情恐怖的书”。

葛德文出生于英国的一个牧师家中，本人也当过传教士。他深受启蒙主义者和法国革命的影响，在同当时的反动政客葛德蒙·柏克就法国革命问题进行论战中，满怀着对法国革命的热忱，著述了《政治正义

论》。在他看来，理性是支配动物生活的真正动力，它将人类引上不断改良和日趋完善的道路。政府庇护非正义制度，维持人类财产的不平等现象因而所有政府都是恶，如果废除了政府，社会可以通过理性法则来维持。他认为，现行的私有财产制度使人颂扬私心，崇拜压迫者，追逐奢侈和罪恶，因而它违反了正义的原则，是人类贫困和罪恶的根源。这就必须废除私有制，去建立一个实行产品的公有和公平分配财富的平等的理性社会。

在书中葛德文彻底地批判了人口过剩的论调。他认为：“地球上人类能够居住的地方目前3 / 4没有耕种。已耕种的部分能够无限地加以改善。在几万个世纪里或许人口是继续不断的增加着，可以看到，地球依旧是能够充分地养活它的居民的。……对于成为人类本质利益的筹划和打算，说什么人类太过于幸福了，说作为必然的结果在遥远的将来人口将变成太稠密了而退缩回来，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因此当地球不能再收容更多的人口时，活着的人将停止繁殖。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造成那么多人口的错误动机或义务的任何动机已经不存在了。不但如此，而且人将会变得长生不老，社会上只是由大人构成，小孩子也不会存在了。”

1797年，即在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一版

出版的前一年，葛德文又出版发行了可称之为《政治正义论》的续编的《研究者：教育、习俗及文艺的评论》（简称《研究者》）。他在该书题为“财富和贫穷”的一篇中指出，贫穷的真正弊病不在于身体上的欠缺，而在于缺乏财富。在另一篇“贪欲和奢侈”中，他驳斥了资本能给穷人提供职业，是穷人的恩主的说法，指出了机器工业的发展延长了穷人的工作时间，加强了对工人的奴役；说明了富人并没有付给穷人应得的报酬，因而加重了穷人的痛苦。这后一篇直接促使《人口原理》的产生。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第一版的序言中说：“有一次，同一个朋友（马尔萨斯的父亲——引者注）谈到葛德文先生《研究者》一书中论述贪欲和奢侈的那篇文章，这便是本书的缘起。”马尔萨斯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崇拜18世纪的启蒙思想，与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休谟、卢梭有比较密切的交往，思想颇为激进。他同情法国革命，赞扬社会改革。他在读了葛德文的《研究者》之后，十分激动，并把这风靡一时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著作推荐给马尔萨斯去看。不料，马尔萨斯读过之后，并不像父亲那样激动，相反对它的叙述抱反对态度。实际上马尔萨斯对法国革命和葛德文、孔多塞的著作都持反对态度，甚至还在大学期间，他就已激烈地反对过葛德文和孔多塞的革命思想。

和一般的父子不同，年老的父亲思想激进，热烈地拥护革命，而年轻的儿子却思想保守，并批判激进思想。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马尔萨斯“下决心把自己的思想整理成文，予以发表”。在书中，马尔萨斯对葛德文、孔多塞的社会改革思想，还包括瓦雷斯、休谟、亚当·斯密等的思想，加以大批特批，以匿名的方式，于1798年抛出《人口原理》。《人口原理》发表后，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等学科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在他生前出过6版。第二版出版于1803年，第三版出版于1806年，第四版、第五版出版于1807年，最后一版出版于1826年。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差异稍大，第二版以后各版虽然多少有些不同，但就其基本思想来说和第一版无根本不同。

1798年匿名发表的第一版，题目为《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家的推测》，是一本论战性的著作。第一版分19章。第一章提出他的人口原理的两个永恒法则；第二章论述了3个命题；第三章至第七章企图从历史和当时英国的实际情况来证明“三个命题”的妥当性；第八章至第十五章主要是批评孔多塞和葛德文的改革思想；第十六章至第十九章主要讲

人口抑制问题。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一版存在的问题和缺陷都非常明显，缺乏理论的论证。连后来信奉马尔萨斯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太简单化”、“太粗糙”。马尔萨斯本人在《人口原理》第二版的著者序中也承认，第一版“是由于偶然的冲动并根据我当时在乡村的环境中所能得到的少数材料而写成的”。马尔萨斯在写作第二版时，读到安德森（James Anderson, 1738-1708, 英国的农场主和经济学家，在李嘉图之前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级差地租的原理，是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先驱者）在1777年至1796年出版的《农业与农村论》，在1799年至1802年发表的《关于农业、自然史、艺术及各种问题的文录》，才歪曲地利用安德森的观点，较为明确地描述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在马尔萨斯写作第一版时，英国正处于农业变革时代，他看不到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的历史作用；后来他不能不承认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但还是加以曲解。

为了使自己的人口理论能够信服于人，马尔萨斯推出了他的《人口原理》第二版。再版的著作从外形和内容可以说都是全然是新的。从外形看，初版用8开纸396页，大约51.5万字，而二版是用4开纸600字，字数增到20万，由匿名著作变成署名著

作者真实姓名和衔头的著作，书名也改为《人口原理对于人类幸福之过去及现在之诸影响的考察。附考察将来关于消除或缓和由人口所生的弊害的研究》。从内容上也一变过去那种批判空想思想的论战性文体，而成为细致的归纳性的研究。第二版包括一个序言（第二版著者序）和4卷。第一卷共14章，前两章论述他所提出的人口原理的基本内容，后12章论述的是所谓文化发展落后的地区和过去时代的人口抑制。第二卷共11章，是前一卷的继续，论述近代欧洲各国人口的抑制。在这两卷中，马尔萨斯试图以实例作为他所提出的人口原理作佐证，并证明“道德抑制”和“积极抑制”在历史发展中的不同阶段，作用不同。在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低下，文化落后，缺少理性，“积极抑制”起着主要作用；在近代社会，生产力有很大提高，理性作用加强，“道德抑制”逐渐起着主要作用。第三卷共10章，马尔萨斯依据他的人口原理，反对葛德文、孔多塞等人的社会改革思想，反对济贫法，反对废除谷物法，比较不同经济状况下财富和人口增长情况。中心思想是，只有抑制人口增长方可能改善贫民状况，要想取消对人口的抑制，那就根本上不可能改善贫民生活。第四卷共14章，阐述消除或减少由人口因素所生成的灾害的前景。这一卷主要宣传只有“道德抑制”才可能消除贫困和罪恶，

给人类带来光明的前景。

如前所述，第二版与第一版基本思想一致。二者真正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版认为只有增加人口的死亡率才能抑制人口增长，第二版则主张通过降低人口出生率来控制人口增长。马尔萨斯在第二版序言中也承认第二版的重大变化就是上述这一点。相比较而言，第一版写得通俗，简单明了，因而流传得比较广泛。以后各版论证愈来愈繁琐，更加上论理用意之周到，引用文献之丰富，以及文章之典雅含蓄，使人们通读的兴趣逐渐减少，其理论也难以让人理解。马尔萨斯的理论在理解上的困难，连著名的马尔萨斯研究者和人口学家都为之叹息。例如坎南(Cannan, E.)曾写道：“对一个最健全的经济学家，如果有人坦率地问他：马尔萨斯所理解的人口原理是什么？或者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什么？他也会迷惑不解。”蒙伯特(Mombert, P.)也曾写道：“用明了的形态描绘出马尔萨斯严密的要求是什么，考虑了什么，无论如何也不是简单容易的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实际是个暧昧的著作家，尤其是关于人口规律，他的著作含有很多矛盾。”

为什么要写《政治经济学原理》

1820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马尔萨斯的另一部主要著作。他死后，他的朋友奥托主教作了补充，于1836年出了第二版。

和《人口原理》一样，马尔萨斯写作、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一方面是代表土地贵族的利益反对代表工业资本家利益的李嘉图，另一方面是代表资本家和土地贵族利益反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在19世纪最初30年里，英国新兴的工业阶级和土地贵族阶级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起源于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谷物法”的颁布。具有强烈的资本积累欲望的工业资产阶级认为谷物法限制了从国外进口廉价谷物，人为地提高了国内谷物的价格。这就意味着土地贵族因谷物高价而获得高额地租，也意味着工资提高和利润下降，导致资本积累减少。而土地贵族所获取的地租绝大部分都花费在自己个人奢侈糜烂的生活上，是对社会财富的浪费，这也不利于资本积累。因此，他们主张废除谷物法，作为社会纯收入的地租，最好不要落在土地贵族手里，应将地主所得的“纯收入”归于工业资本家，用于资本积累。在这一斗争中，李嘉图1817年出版了《政治经济

学及赋税原理》，他站在当时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立场上，证明谷物价格上涨和地主占有地租，引起工人名义工资的上升和利润的下降，妨碍了资本积累，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作为土地贵族辩护士的马尔萨斯却力图证明土地贵族获得的地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过快的资本积累是危险的。在他看来，如果否定了地租，也就否定了土地贵族的存在，而若否定了土地贵族的存在，就会出现消费不足的经济危机，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因此，地主阶级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同时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中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价值是劳动创造的，而工人的纯收入——工资，同资本家所得——利润是直接对立的，而利润和地租也是对立的观点。这个学说首先把土地所有者推上了同广大劳动者、甚至同产业资本家完全对立的地步，从而深深地刺痛了土地贵族的神经。马尔萨斯从土地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利益考虑，害怕这将给工人阶级以反对统治阶级的理论武器，于是赶紧起来，激烈地反对李嘉图的这一观点。他以推翻李嘉图的经济学说为己任，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3年之后，便针对李嘉图的这本著作，迫不急待地抛出了《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接着又陆续出版了《价值的尺度》（1823年）和《政治经济学定义》（18

27年)。在这些著作中，马尔萨斯抓住李嘉图价值理论中的缺陷，攻击一点，不及其余，从而拼凑了一整套庸俗的价值理论。

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包括一篇导论和两卷。第一卷共6章。第一章“财富和生产性劳动的定义”，第二章“价值的性质、原因和尺度”，第三章“地租”，第四章“劳动工资”，第五章“资本的利润”，第六章“财富和价值的区别”。这6章提出了如下观点：价值是由购买劳动以及供求关系和生产费用决定的；地租是自然赋予的；利润是从交换中得来的；工资是由劳动者的供求决定的。马尔萨斯完全否定了李嘉图的工资和利润对立、利润和地租对立的结论。第二卷只有“财富的增长”一章，主要阐明他的市场理论和实现论，企图说明只有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土地贵族等，才能提供足够的“有效需求”，避免商品过剩危机。

第三章 浅薄的小册子

杜撰了一个“永恒的人口规律”

马尔萨斯著书的主要目的远非为了提出人口原理，而是为了反对著名的激进思想家葛德文、孔多塞。他说：“某个著述家也许会对我说，人类最终将变成鸵鸟。我无法适当地反驳他。不过，凡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同意他的看法，除非他能证明人类的脖子在逐渐变长，嘴唇在逐渐变硬，愈来愈往前突，腿和脚的形状每天在变化，头发开始变成毛管。在能证明人类有可能发生如此奇异的变化以前，说他们变成鸵鸟会如何幸福，说他们能跑得飞得如何快，说他们将蔑视一切小里小气的奢侈品，而只采集生活必需品，因而每个人的劳动将减轻，每个人将享有充裕的闲暇，那肯定是白费时间，白费唇舌。”他借这一番的隐喻，讽刺、嘲笑、反对葛德文、孔多塞。

于此，马尔萨斯提出了所谓的两个“固定法则”作为他的理论前提。

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

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

葛德文在《政治正义论》中曾预言人的性欲可以自我控制，这已为科学发展的客观现实所证实。而马尔萨斯认为第一个前提是不证自明的，第二个前提也是葛德文等人无力予以驳诘。马尔萨斯说：“在消除两性间的情欲方面，迄今却尚未任何进展。两性间的情欲今天仍同2000年或4000年前一样强烈。现今同以往一样，也有个别的例外。但是，由于这种例外的数目似乎没有增加，因而，若仅仅从存在着例外就推论说例外最终将成为规则，规则最终将成为例外，则很显然，这种推论是很不讲究辩论的哲学的方式的。”马尔萨斯断言他所提出的两个法则是永恒不变的，自从我们有任何人类知识以来，似乎就是我们本身的固定法则。既往，他不曾看见此等法则的任何改变，我们当然没有权力可以断言，于今日为然者，于将来当为不然。

马尔萨斯从上述的所谓人类本身固定的两个法则，引申出两者之间的增长不平衡。他认为男女之间存在着不变的情欲，人口必然不断增加，而维持这些不断增加的人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是怎样增加的呢？他说：“一旦接受了上述两其公理，我便可以说，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

人口若不受到限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懂得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么巨大”。

马尔萨斯认为：“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大自然极其慷慨大方地到处播撒生命的种子。但大自然在给予养育生命种子所必需营养方面，却一直较为吝啬。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命种子，若得到充足的食物和空间，经过几千年的繁殖，会挤满几百万个地球。但贫困这一专横而无处不在的自然法则却可以把它们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植物与动物都受制于这一伟大的限制性法则。”他从两条“公理”出发对人口增长和食物增长之间的对比作出了如下论断：“设世界人口为任一数目，比如说10亿，则人口将按1、2、4、8、16、32、64、128、256、512这样的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将按1、2、3、4、5、6、7、8、9、10这样的比率增加。225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之比将为512比10，300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之比将为4096比13，2000年后，两者的差距将大得几乎无法加以计算，尽管到那时产量已增至极高的水平。”按马尔萨斯的描绘，第一种力量大大超过第二种力量，这样一来，任何人间乐园都不可能实现，人类只能永远生活在贫穷困苦之中。而事实并非如此，如美国在1950年时，每

个农民的生产只能供 1.5 个人消费，当时人口为 1.4 亿；到 1978 年时，每个农民的生产足够 5.7 个人消费，而人口只增加到 21.2 亿多。可见，这段时期美国生活资料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率。

事实胜于雄辩。如果世界人口每 25 年增加 1 倍，那么从马尔萨斯的理论出世算起，现在世界人口应该是 500 多亿，而不是现在的 50 多亿。

为了使虚构的“定理”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基础，马尔萨斯从安德森 (James Anderson, 1739-1808, 英国农场主和经济学家，在李嘉图之前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级差地租的原理，是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先驱者) 那里引述了“土地收益递减规律”。马尔萨斯认为人类生活资料是由较低形式的动植物所组成，如果土地的供给大到足以与膨胀的大概相适应，在没有阻碍的情况下，“它可能永远增长并且增长得大于任何可指定的数量”，人口与食物的供给可以均衡发展。但由于地球表面的有限性，按照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递加投资，农产品的产量不是相应地增加，而是递减，食物的供给终于变得越来越吃力。而人口的繁殖并不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人口的力量在每一个时期里仍然占着那么大的优势”，人口的增长率与食物的增长率能平衡发展。由此马尔萨斯断言，即使能创造出像葛德文所想象的理想的社会制度，

在那个社会里，如果丧失阻止人口增长的压力，它也不会长久存在下去。因此人们的贫困和饥饿不是人的过剩，而是因为土地的生产力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扩大，无力供养的结果。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人类社会由贫穷所产生的不幸，是顽固的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与社会制度无关。

马尔萨斯在把世界描绘得天昏地暗不可终日之后，这位“悲天悯人”的神甫提出了解决人口过剩及其所导致的饥饿和贫困的妙术。这种妙术就是两种“抑制”：积极抑制和预防抑制。

马尔萨斯认为，人类生存必需食物，这是普遍规律，人类的情欲必然导致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在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两者不平衡的时候，人口自然规律要求两者必须保持平衡。这就必然产生一种强大的妨碍来阻止人口增长，这种妨碍就是贫穷与罪恶，它表现为失业、疾病、饥荒、瘟疫、暴行、战争等，即所谓的“积极抑制”。

马尔萨斯说：“对人口的积极抑制是极其多样性的。它包括产生于罪恶或苦难的各式各样的原因，或多或少都会缩短人的寿命。所以，在这一类里可以举出各种不卫生的职业，剧烈的劳动和受严寒盛暑的煎迫，极度的贫困，对儿童的恶劣保育，大城市的拥挤，各种各样的过度行为，连串整套的普遍疾病和传染病、

战争、瘟疫和饥荒。”简单地说，所谓人口的积极抑制，就是用提高人口死亡率、消灭现存人口的办法，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保持平衡。尽管马尔萨斯非常露骨地鼓吹饥饿、疾病、战争、溺婴、贫困、阻碍增殖的社会习惯等，在抑制着人口增长倾向中有所谓“巨大”的作用，但他对别人的反对和谴责感到很委屈，痛苦万分。他认为自己并不同意疾病和溺婴，更不是鼓励战争和饥饿。他辩解说：“把我判断为人口的敌人是完全误解我的议论的。我只不过是罪恶和贫困的，从而是产生这些在人口与食物之间不利的比例的敌人而已”。

马尔萨斯在第二版中放弃自己是一个批评者，俨然以一个社会改良者的面目出现，在人口抑制方面作了一些新的补充，那就是他给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找到了一个摆脱贫困和罪恶的“妙法”，即所谓“预防抑制”。

预防抑制包括道德节制和罪恶抑制，其作用在于使出生率减低，防止新的人口增加。道德节制就是节欲，推迟结婚，直到具有赡养一个家庭的能力时才结婚，并且避免不规矩的满足。罪恶抑制指避孕节育、独生主义、打胎、不正当不自然的交接等。他认为道德抑制是上策，罪恶抑制是下策，因为牧师的观点看，后者是不道德的、不自然的行为。为了防止人口过度

增长，关键在于做好及早的和充分的“预防抑制”，以免将来出现“积极抑制”。马尔萨斯的这个观点多少有一点参考价值。

按照马尔萨斯对道德抑制的解释就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无力赡养子女就不应该结婚，而且在婚前要保持贞操，不然就要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因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应该晚婚、独身、禁欲，这就是马尔萨斯所标榜的“黄金道德”。否则，按马尔萨斯所说，由于人口增殖超过生活资料增长而产生的贫困和罪恶就不可避免，作为人类病患的战争也无法解除。马尔萨斯认为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和最强烈的刺激无疑是生存空间和仪器的缺乏，子孙的繁殖既是战争不息的结果又是它的原因。在马尔萨斯看来，战争的根源就是人口迅速增加。因此必须对人口采取积极的抑制和道德节制，似乎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保持平衡，就可以消除一切灾难。马尔萨斯的荒谬理论成了统治阶级发动战争的幌子和引以开脱罪责的牌子。

人口必须抑制，他引用一个寓言来作比喻：食物与人口的增长，就像乌龟和兔子赛跑一样，只有使兔子乖乖地睡觉，乌龟才能赶上它。在食物与人口生产的比例关系上，不管什么国家要发展经济都要求两者相适应。马尔萨斯建议让兔子去睡觉，就是要求两者的速度按一定的比例关系保持平衡。在今天，这一点

仍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像非洲的一些国家，其意义更为明显。马尔萨斯认为使兔子乖乖睡觉的最好方法，就是道德抑制。如果不向人们灌输道德节制的责任感，势必促进罪恶的滋生，而鼓励婚姻和人口的增加，则又促进灾难的滋生。他认为罪恶和灾难等是古代社会的抑制方法，现代文明社会是道德抑制占优势。现代社会(指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能够保证道德节制的良好效果，是因为存在着私有财产制度。这样，人们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能够通过自我克制来阻止人口增长。

马尔萨斯歇斯底里、大喊大叫：饥饿和贫困是因为人类增殖过快，人口绝对地过多，多余人口的饥饿是咎由自取，他们理应去死。他说：在一个已被占有的世界中出生的人，如果不能从他具有正当要求的双亲那里取得生活资料，以及如果社会并不需要他的劳动，那么他就没有取得最小量食物的权利，事实上他在地球上是多餘的，在大自然盛大的筵席上并没有为他设下空的席位，大自然将命令他离开，并且如果他不能取得大自然的某些客人怜悯的话，大自然会迅速执行她的命令的。

马尔萨斯还考察了农业国、工商业国和农工商业国家的财富和人口增长情况，力图证明不论什么样的经济结构，他们的人口规律都起支配作用，但人口抑

制的方式有所区别。

无论马尔萨斯如何编造人口抑制的方式，由于其立足点是不科学的，其观点的正确性自然大大地要打折。其实，与马尔萨斯说的恰恰相反，人类社会的相对过剩人口都是和私有制结下不解之缘的，资本主义相对过剩人口，决定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特有的人口规律。

马尔萨斯对人类前途是悲观的。他错误地断言，不管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粮食增长率，落后于人口增长率，是不可抗拒的超历史的自然规律。从两者的比例关系看，当时世界若干地区确实存在这种现象，但随着科学的进步，技术革命的推进，在不断扭转这种趋势。当前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统治地位的国家，粮食增长率日愈赶上或超过人口的增长率。若干经济发达的国家，由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国民收入和总就业量的不断增长，教育文化的普及提高，文化生活的多样化，社会兴趣和习惯的改变，医药卫生的进步，保险事业的开展，对人的质量的重视等等，使出生率和死亡率逐渐下降。总的说来，目前大多数国家人口增长率已经缓慢下来了，有的停止增长，有的甚至长期下降，出现负增长的现象。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富裕，在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的情况下，

世界人口最终是会趋于稳定状态的。富裕会降低出生率，贫困会促进人口繁殖，人口增长率往往同一个经济发达国家拥有的生活资料数量，策略发展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高低成反比。这是一条平凡的真理，而马尔萨斯的见解，则与此相反。

马尔萨斯在归纳他的人口理论时提出了 3 个论点：

- 1、人口的增长必然地为生活资料所限制；
- 2、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除非受到某种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的阻止；
- 3、这些抑制，和那些遏止人口的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与生活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以归纳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

这 3 个“命题”和前面讲到的两个“公理”就构成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即所谓的“支配人类命运的永恒的人口自然规律”。

马尔萨斯把他的人口规律作了这样的概括。他说：在人口增长已经达到食物的最大限度时，一切预防的和积极的抑制自然而然地会经加强的力量发挥其作用，直到人口降到食物水平之下。这时比较丰足的状态又回来了，于是再度导致人口的增长。不过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它的进一步的发展又会因同样的原因而受到抑制，即产生破坏——均衡——破坏的平衡与不平衡

往复运动。

马尔萨斯论中国人口问题

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原理》第一版第四章、第七章、第十六章等章中谈到了中国人口问题，认为人口规律在中国也发生作用，同样存在人口过剩情况，中国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必然受到预防抑制和积极抑制的作用。他没有根据地胡说，中国的气候在无论那一方面都特别适宜于生育孩子，而妇女们又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更有繁殖力。他说：“如果我们能肯定，中国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几乎全部土地都已被耕种，大部分土地每年收获两次，人民生活得很节俭，则我们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断说，中国的人口肯定非常多，而用不着再费心去考察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和早婚所受到的鼓励。”

马尔萨斯认为中国人口多的主要原因：一是土地肥沃，是世界最适出产农产品的地方；二是绝大多数人都在生产人类所需要的粮食；三是早婚受到鼓励。他说：盛行早婚必然造成人口过剩。那么使人口降低到生活资料的水平的抑制和夭折又将是哪种抑制和那一形式的夭折呢？在他看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抑制，一是预防抑制，在中国大量的主要的应该是出卖自身

与家属为奴仆，作为男仆和丫环被束缚在某一个家族里。因为“大部分的仆人在中国，正像在欧洲一样，是不结婚的。”或者是出家当和尚，或者过独生的居士生活，这两种形式也有助于减少人口出生率。二是积极抑制，中国“肯定受到了不时发生的饥饿和弃婴习惯的抑制，弃婴现象是很普遍的，是欧洲人所无法想象的。关于这种野蛮的习惯，我们不能不说，要证明食物匮乏给人类带来的苦难，最有力的证明莫过于，连这种最违反人类自然感情的习惯竟然也能在人间见到。这种习惯在古代似乎很盛行，似乎确实颇有助于减少人口”。他还说：“如果饥饿不是时时减少中国所拥有的无量数的居民，它就不能太平平地过日子。”马尔萨斯不顾中国封建制度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事实，歪曲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发展的状况，把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中国人民的贫困和饥饿一概归结为人口绝对过剩是极其荒谬的。

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第一版第十六章中还从另外一个角度谈到中国人口问题。马尔萨斯实实在在地或者说无可奈何地承认：“其实济贫税的大幅度提高就有力地证明，穷人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并未增加。在这方面穷人的境况与其说得到了改善还不如说恶化了，此外，现在有比过去多得多的穷人在大制造厂内干活儿，无论在健康上还是在道德上都

深受其害，若考虑到以上两点，就不得不承认，近年来财富的增长丝毫无助于增加穷苦劳动者的幸福。”

“一国资本或收入的每一增长，不能看作是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的增长，因而也就不可能对穷人的境况产生有利不影响。把这一点应用于中国，这一点会看得很清楚。”他认为中国人口过于稠密，而中国财富据说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特别是中国的每亩土地都已耕种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很难想象土地年均产量每年还会有很大的增长。可以说，中国的食物数量已到了土地所能提供的最高产量。这样，无论采取什么方式，譬如说重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运用大量资本建立制造业，都不能解决中国的下层人民的生活问题。因为尽管中国可以发展制造业，制造大量产品供出口，似乎可以增加财富，但它势必要从农业中吸收大量劳动力，致使国家粮食总产量减少。食物数量不增加，反面有减少的可能，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又是保持不变的，甚至减少。因此，中国财富的增长与其说会改善穷人的生活境况，还不如说会使穷人的生活境况恶化。就所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的数量来说，穷人状况和以前相同或者比以前更差，而且会有许多穷人不再从事有益于健康不农业劳动，改而在有损于健康的制造业中干活儿。在马尔萨斯看来，由于中国人口太多，所以穷苦的中国下层人民没有救

了；中国最好维持现状，从事农业，生产粮食，不能从事其他产业，否则穷苦人的生活境况会更差，这一点也表明了马尔萨斯反对工业文明的保守落后的思想，认为制造精损健康。实际上中国人民的贫穷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从事什么产业，而在于腐朽的封建社会制度。

反科学的“人口自然规律”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洋洋数万言，但实际他的基本思想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的增长必须保持平衡，但人口增长总是优势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因而食物不足，必然产生饥饿、贫穷、失业乃至战争。所以，必须采取积极的抑制和预防的抑制，把多余的人口消灭掉。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反科学的实质，首先表现于他把人口现象看成是自然现象，把人口规律说成是超越社会制度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马尔萨斯完全抹杀了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抹杀了人类要满足其食欲和性欲都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条件、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一事实，歪曲人口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真实意义。人活着就要吃饭，没有生活资料就不能生存；人类还要延续后代，就要结婚，就要生儿育女，这是无可异

议的，用中国古话说就是“食色性也”。然而问题不在于说明这种众所周知的事情，而在于说明人类怎样生产、交往和分配生活资料以及如何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下去延续后代。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有两重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方式中生产和生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的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的生物学行为总是受到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性质及其相互矛盾运动的影响和制约，在阶级社会中，要受阶级斗争的影响和制约。马尔萨斯却把人等同于一般的生物，从纯生物学的角度来考察人口规律，而完全撇开人的社会性，是根本错误的。要说明生活资料是怎样生产和分配的，就必须研究特写的社会经济制度。同样，人口状况也是受社会经济制度制约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具有不同的人口规律。所以离开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谈论人类生存必需生活资料、两性间必然存在情欲，是毫无价值的。

人口状况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没有一定数量人口的存在也就谈不上物质资料的生产。但是人口的数量只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或必要条件，而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因为人口状况本身不能说明：为什么在一定历史阶段只能是这一种社会生产方

式而不是别的社会生产方式，为什么人口状况不同的地区可以有相同的社会制度，而人口状况相似的地区却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如中国和印度人口状况相似，社会制度却迥然各异。因此，人口密度不能说明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人口多的国家不一定是社会制度先进的国家，而人口少的国家不一定是社会制度落后的国家。人口密度的高低和人口数量的增减不能成为社会革命的原因，也不能说明社会制度的更替。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只是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前提。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只能是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谋取方式，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口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口本身也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不同生产方式下具有不同的特殊的人口规律。离开了生产方式、离开了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阶级，人口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为在阶级社会里，人口是由不同阶级构成的，阶级地位不同，人们的经济状况、生活习惯、道德观念、政治思想以及人口增殖状况也就迥然不同，因而也就形成不同的人口规律，如奴隶社会的人口规律、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抛开特定的生产方式，也就说不上什么人口规律。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却把人等同于一般的生物，从纯生物

学的角度来考察人口规律，而完全撇开人的社会性，这是根本错误的离开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抽象地谈论生活资料的增长和人的情欲，是毫无意义的。

其次，马尔萨斯的“两个级数”和“三个命题”，也同样犯了把人口现象看作自然现象而抹杀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作用的错误。人口按几何级数率增长所假设的“无所妨碍”的前提是根本不能成立的。马尔萨斯自己也很清楚，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无所妨碍”的人口增长，并且承认它要受穷困生活所带来的困难的限制。马尔萨斯在虚构的前提上论证“两个级数”，无非企图用以证明：人口过剩以及由此造成的失业和贫困是“人口法则”的必然结果，是任何社会所无法避免的。

第三，马尔萨斯仅仅把人口和生活资料作数字对比，抹杀了这种关系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也是十分错误的。马尔萨斯所提出的人口要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保持正常比例的命题，很有欺骗性，似乎这种比例关系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的；而且，人口过剩似乎就是由于人口和生活资料失去平衡，破坏了正常比例而产生的，因此是绝对的人口过剩。事实上，人口和生活资料的关系，取决于人口和生产条件的内在联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受不同的人口规律和经济规律支配。在资本主义社会，过剩人口只是一种相对于生活资料

的生产条件而言的过剩人口。在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工人的必要劳动能否实现，能否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是以能否为资本家提供剩余劳动为前提的。就资本家来说，由于经常存在着过剩人口，在扩大生产时，资本家可以随时在市场上找到所需要的劳动力，而且还可以以此不断降在业工人的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强化对他们的剥削。同时过剩人口的存在，使资本家压制工人对资本剥削的反抗有恃无恐，因为他们可以雇佣失业工人来代替敢于向他们进行斗争的工人。显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任何一个资本家，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去消灭失业人口，因为这种失业人口——正是他们用来加强对工人剥削和压制的有力武器和手段。因此这个过剩人口不是同生活资料相比成为绝对多余的人口，而是同资本积累相比变为相对过剩。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一个人口规律，失业和贫困完全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产物，而不是什么人口增长太快的缘故。人口过剩和生产过剩、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同时存在的。马尔萨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失业和贫困的根源，杜撰了一个所谓的“自然人口规律”，把人口过剩以及失业和贫困都归因于工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长，借此抹杀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企图消除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充分表明了马尔萨

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立场。这也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反科学性的一个突出表现。

马尔萨斯对于人口过剩、生产过剩、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并存的事实的解释在理论上也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断言工人人口绝对剩，把从事生产的工人说成是多余的；另一方面又直接为那些不劳动的贵族、地主和各种寄生虫辩护，把这些人说成是必要的，是实现利润所必不可少的。他一方面从为剥削辩护的需要出发，把贫困归因于工人人口的增长，而主张减少人口；但另一方面又从资本积累的需要出发，而称工人阶级要是不增加人口，对国家是有害的。马尔萨斯为了达到辩护的目的，他不惜伪造自己的结论去适应剥削阶级的需要，在科学上是极其卑鄙的，也毫无科学所要求的严肃的态度。

第四，马尔萨斯所主张的恢复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的办法，是减少人口而不是发展生活资料的生产。他完全抛开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完全忽视了科学技术在生活资料生产中的作用，以假定生产力和技术水平不变为前提的“土地收益递减规律”为依据。事实上，土壤肥力是一个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向上变动的量。从长远的观点看，从人类开始耕种土地以来，土地的肥力不但没有递减，而且伴随着精耕细作和各种科学技术的运用不断提高了。在大量事

实可以证明，在人类劳动和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坏地能变为好地，不能耕作的土地能变为沃土良田，土地收获量能够不断提高。

所谓“土地收益递减规律”还抹杀了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对农业生产的决定性影响，忽视了变革生产方式对提高土地质量、利用土地资源的巨大影响。一个社会农业生产的停滞，最终根源还在于社会制度本身。应该说，在农业中并不存在什么土地肥力递减律的问题，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里，的确存在着土地肥力衰退的现象。这种现象不是土地肥力自然变化造成的，而是土地私有制和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必然结果。农业资本家在进行农业生产之前必须购买土地或以巨额地租向土地所有者租赁土地，才能取得经营农业生产的权利，这是农业生产的首要条件。但是，这样就使得大量的资金不能用于农业生产，而且因土地私有制的存在，阻碍了农业企业规模的发展。特别是租期届满，必须交还土地时，农业资本家不愿意在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植树造林、保护土壤肥力等方面再投资；同时资本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不仅剥削农业工人和农民，而且加紧斥夺土地的生产力。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加剧了这种掠夺，不断破坏土地丰度，造成了土地肥力减退。因此，在私有制条件下，食物增长缓慢的原因，不是由

于耕地有限或土地肥力递减妨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使广大土地不能充分利用和土地肥力得不到应有改善而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广大劳动人民之所以贫困，其真实原因也不在于土地能力递减律和耕地面积有限，而在于劳动人民丧失了生产资料，受尽了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甚至失业、贫困，加入产业后备军，生活日益困难，越来越难于取得生活资料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是失业、饥饿、贫困、罪恶之源，这是任凭马尔萨斯怎样为其辩护也无法掩盖的事实。

马尔萨斯有意地或者是无知地撇开本质的东西，泛泛地谈论现象的东西，并把抽象的东西作为理论的前提，最起码他的理论是缺乏根基的。马尔萨斯就是玩弄抽象的把戏来达到糊弄人、欺骗人的目的。他就《人口原理》出版的目地说道：“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与人的本质本身密切联系的一个大的原因的结果——我这里所说的原因，就是一切生物的增殖有不断超过对它提供的营养的倾向。”也即探讨超过生活资料而不断增长且占更优势的人口的倾向所造成的结果，即失业、贫困和罪恶。既然人口的增殖是失业和贫困的根本原因，那么消除失业和贫困就只有想办法消除人口，制约人口的增长，其用意昭彰。

马尔萨斯由于抛开了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社

会生产方式来谈人口和生活资料的关系，因此处处违反科学、违反事实。这是他站在剥削阶级反动立场、支持为剥削制度辩护的必然结果。他的人口理论的反动性和反科学性是完全一致的。

第四章 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家

庸俗的价值理论

为什么说马尔萨斯是个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家呢？我们先来看看马尔萨斯价值学说。

马尔萨斯的价值理论是从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出发的。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价值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坚持生产商品时消耗的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推动了价值理论的发展，提出了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的价值理论。但在他的价值学说中，出现了两个难关：一是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和价值规律不能调和；二是等量资本得到利润和价值规律不能调和。由于他同斯密一样，把工人出卖劳动力归结为出卖劳动，而不能使问题前进一步。于是马尔萨斯抓住李嘉图价值理论这两个致命的弱点来攻击“劳动创造价值的学说”。他认为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量，不足以说明许多商品交换价值的变动。他所列举的理由是各种商品生产所需要的固定资本的比例有大小的差别，或生产时间有长短的差别；或生产时需要外国进口的原料；或生产品制成后负担不同

的赋税。凡此种种都足以影响商品的交换价值，所以，生产商品时所投下的劳动量不可能作为交换价值的正确尺度；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区更不能作为真实的计算标准。他认为商品价值的尺度应该说是商品所能购买的劳动，否认何时何地商品价值可以由商品在该时该地所能交换或支配的标准劳动量来衡量。只有“商品所能支配的劳动可以看成是商品价值的标准尺度”。他说：“商品的价值平均说来是由它们的自然和必要供应条件决定的。我说这些条件就是商品中所包含的积累的和直接的劳动，加上全部垫支项目在垫支期间的一般利润”。

马尔萨斯利用李嘉图不能运用价值规律来说明利润来源的弱点，把利润排除在耗费劳动之外，断言在社会的任何发展阶段中，耗费劳动都没有单独地决定过商品的价值。他认为在商品价值中，除了耗费劳动以外，利润这个因素，一直被广泛地考虑在交换价值之内。即使把利润作为一种耗费劳动计入商品价值之内，但我们又怎么能够仅仅因为商品在上市之前必须保管一个较长的时间，就认为商品耗费了较多的劳动呢？这就是说，在马尔萨斯看来，即使是把利润也理解为耗费劳动，但也不能认为耗费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的理论是正确的。

马尔萨斯公开嘲笑李嘉图，“诚然，李嘉图先生

自己也承认他的法则有相当的例外。这些例外的品类，就是所用固定资本量不等、耐用程度不同，而所用流动资本的回收时期又彼此各别的商品。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这些品类，就会发现其为数之多，使得该法则可以看成是例外，而例外倒成为法则了。” 马尔萨斯为了攻击李嘉图，否定劳动价值论，死死盯着李嘉图未能解决的两大矛盾，并形而上学地把它们对立起来。他认定李嘉图所谓的商品价值决定于其所包含的劳动量的说法，和普遍的经验事实是不符合的。那么什么是“符合”着“普遍经验事实”的价值决定规律呢？马尔萨斯发展了斯密理论中的庸俗成分，创立了庸俗的价值理论。

不过，马尔萨斯所攻击和批判的李嘉图两大矛盾，的确是当时政治经济学中所亟待解决的问题。他的所作所为起了一种强调矛盾、突出问题的作用，多少有点积极意义。马克思曾经把强调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不平等交换说成是马尔萨斯的真正贡献，也就是指这种意义而言的。当然，马尔萨斯本人的主观愿望目的并不是这样。他攻击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强调这个理论不能解释资本与劳动交换如何产生利润的问题等等，他的目的是要彻底否定耗费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他自己的价值理论来，以便为土地贵族的利益辩护的经济“理论”建立一个“理论”

基础。

马尔萨斯首先分析价值概念的基本定义。他不是从商品出发，而是从价值观念本身出发，把价值分为三种类型，即使用价值、名义的交换价值或价格、内在的交换价值。马尔萨斯的这种划分，只不过是斯密把价值划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翻版，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而他对“内在的交换价值”的解释是十分混乱的。他既把它定义为物品由内在原因所产生的购买力，即一个商品交换其它商品的能力；同时又把它定义为物品的价值。可见，马尔萨斯并没有把交换价值和价值区别开来，而是直接把交换价值称为价值的。不仅如此，马尔萨斯还混同了价值和市场价格的界限，把价值说成是市场价格。而对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价值”，或者说作为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基础的价值，马尔萨斯也作了解释，但是他把它称为“交换价值的尺度”。也就是说，他是在“交换价值的尺度”这个名义下来研究商品价值的，而他在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名义下考察的东西，实际上是市场价格。这表明马尔萨斯并没有真正理解价值、交换价值、价格之间的辩证关系，也不懂得价值对于交换价值和价格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

按照马尔萨斯的观点，价值恰恰等于由内在原因所产生的购买力的内在交换价值。他说“在任何时间

和任何地点，商品的估价总是决定于基本的生产成本“。这种交换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人们对商品的主观“估价”，而估价的依据，一是对该商品的“占有欲望”，二是“获得的困难”。最终“总是决定于需求和供给的相对状况”，“决定于基本的生产成本”。换句话说，商品所能支配的或购买得的劳动等于生产这件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量加上预付利润，也就是这件商品的生产费用。因此，劳动商品生产费用的大小，决定着所换得的劳动量的大小。人们在购买商品时必须付出比商品本身所包含的更多的劳动，譬如说，资本家提供含10小时劳动量的商品，加上5小时的利润，买者就得支付15小时的劳动量。所以在交换中两者的劳动量是不相等的，利润正是产生于这种不等价的交换过程中。很显然，他是把货币或商品当作资本的价值增值的，即商品在这一种特殊机制上所有的价值，和商品本身的价值混同着。

马尔萨斯把交换价值说成是价值的基础，然后以此为前提抛出了庸俗的供求价值论。但是供求论只能说明供大于求，价值(实际上是交换价值)下降，供小于求，价值(交换价值)上升，而不能说明供求关系一致时，价值(交换价值)由什么决定的问题。马尔萨斯为了摆脱这个困境，提出了价值决定于“需求强度”的论断。他说：“不论需求者对一种商品的购买意愿

和能力如何的大，如果这种商品能用低价购得，谁也不愿意付出高价去购买；因此，如果卖者的能力和竞争继续使人们按低价供给市场以所需要量，需求的全部强度就不会表现出来”。而在货币价值不变时，“某些商品因为数量稀少或者生产费用增大，变成更加难于获得，以致除非是愿意并且能够为此支付较多的货币而无法获得，那么，这种较高的代价，必须认为是较大的需求强度的表示”。换句话说，“购买商品所支付的价格较高，必然意味着较大的需求强度”。

从以上不难看出，所谓需求强度不过是“具有购买能力的购买愿望”。而这种意愿的变化又取决于商品的价格。这样一来，就不是需求强度决定商品的价格，反而是价格决定需求强度了。马尔萨斯本来想以“需求强度”证明价格并不是简单地取决于供求比例，似乎在供求比例形成之前，价格已由“需求强度”决定了。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当他还没来得及自圆其说时，又掉进了循环论的泥坑。商品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而供求关系又以价格为前提，因此，需求强度是由价格决定的。

既然需求本身先以价格为前提，那么需求所依存的价格又是怎样决定的呢？马尔萨斯又从供求论转向生产费用论，认为价格取决于生产费用(生产成本)。什么是生产费用呢？马尔萨斯不得不求助于工资、利

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公式。他说：“任何可以交换的商品的通常价格，可以认为包括三个部分——在生产中所雇佣的劳动者的工资；使生产得以进行的资本的利润(包括对劳动者的垫支在内)；地租，即使用地主的土地的肥力的报酬”。在他看来，在供给一致的情况下，为了保持这个一致，就必须保证商品持续不断地供给。而要保证商品的不断供给，那就得保证商品持续不断供给的各项必要条件，即保证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支付。这样马尔萨斯就从供求关系决定价值转到生产费用，即三收入决定价值的结论。

马尔萨斯绕来绕去，转了一圈，仍没有说明价格决定的问题。于是他只好强词夺理，认为即使出现了价格要由生产费用决定的情况，也不能否定商品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法则。因为商品价格由生产费用来决定是罕见的。只有在供求始终一致的情况下，生产费用本身才会影响这商品的价格。然而，这种情况是暂时的，不会持久。而生产费用要能对价格发生决定作用，也离不开供求关系的“法则”。因为生产费用决定价格，就是指价格随着生产费用的变化而变化。但生产费用之所以会引起价格的变化，其原因仍然是供求关系。他说，“我们都承认，生产费用下降时，价格总是要普遍地跟着降低；但是具体说来，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商品价格下降呢？……这是由于实

际已有的或者可能会有的供给不足”。他还认为，就生产费用本身而论，它的各个构成部分(即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格，也是由供求关系的决定的。

马尔萨斯价格理论的错误在于，一是他脱离商品的价值，把供求关系作为决定商品价格的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否定了价值对于价格的决定作用。二是生产费用论也无法证明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的正确性。因为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单就生产费用的下降，并不一定会出现供给的减少而引起价格的上升。就其本质来说，生产费用下降而引起的价格下降，原因在于商品本身的价值下降；生产费用增加时出现的价格上升，其原因是商品本身的价值增加。再就生产费用的价格来说，它也不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因为生产费用既然有价格，那它也是一种商品，或者说表现为一定的商品。因此，生产费用的价格同其它商品的价格一样，是不可能用供求关系予以说明的。特别地，马尔萨斯所说的生产费用(或自然价格)，只是指由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入所构成的那种生产费用。它并不包括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这一部分价值。因此，如果商品真的按照这个价格出售，那么资本家就不可能收回他投在生产资料上的那一部分资本。显而易见，用这种由收入构成的生产费用来决定商品的价格，是不真实的。

马尔萨斯在说明了商品的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以后，又在“交换价值的尺度”或“价值尺度”的名义下，考察了商品价值的决定问题。他认为，用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作为商品价值的尺度的学说，只有在单独使用劳动就能生产商品的情况下才是适用的。因为在这种条件下，生产商品根本没有使用资本，也就没有利润，所以这种商品的价值的大小就恰好等于它在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量。但是，这种情况是十分罕见的。因为一般地，人们要生产商品，不仅使用劳动，而且必须使用资本。而要使用资本，那就必须要求有利润，因此利润就势必成为商品价值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然而马尔萨斯并不了解利润和耗费劳动的关系，把利润同耗费劳动对立起来。他根本不了解，利润也是耗费劳动所创造的，它来源于雇佣工人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无酬劳动部分。这样，耗费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论断是“错误”的。然而马尔萨斯并不了解利润和耗费劳动的关系，把利润同耗费劳动对立起来。他根本不了解，利润也是耗费劳动所创造的，它来源于雇佣工人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无酬劳动部分。我们知道，雇佣工人的劳动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必要劳动，这是资本家付了工资的，它生产的价值用来补偿资本家垫支的工资；而另一部分则是无酬劳动（即剩余劳动），它生产的价值就是由资本家无

偿占有的剩余价值，被歪曲称为利润。由于马尔萨斯不知道这一点，把雇佣劳动者的全部劳动都看成是支付了代价的，从而把工人的全部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混同于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这样马尔萨斯就武断地认为，除了只用劳动就能生产商品的特殊情况外，耗费劳动是绝对不可能决定商品价值的。

既然商品不能由耗费劳动决定，那么它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马尔萨斯认为，唯一能够决定商品价值的就是商品所能购买的劳动。只要用购买的劳动来决定商品的价值，那么不论是商品的价格还是价值，都能获得一个“标准尺度”，即商品所能购买到的劳动量。商品的价值为什么就能够用商品所能购买到的劳动量来决定呢？因为马尔萨斯认为，商品的价值平均说来是由它们的自然和必要的供应条件决定的。他说：“这些条件就是商品中所包含的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加上全部垫支项目在垫支期间的一般利润”。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消耗并不包括利润，从而也就不能说明商品的供应条件和决定商品的价值。能够说明商品供应条件的只能是“商品与劳动的交换关系”，只有商品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才能保证商品的供应条件。因为“商品一般所能支配的劳动量必然可以代表和衡量其中所包含的劳动量和利润”。正是由于这样，所以马尔萨斯断言：“如果我们说商品的价值就是它所得到的

的估价，那便肯定只有它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才能衡量这种估价”。

马尔萨斯所谓的商品价值决定于商品所能支配的劳动量的结论，是十分错误、极其荒谬的。错误的实质就在于他混同了商品的价值和商品作为资本的价值增殖。实际上，商品的价值和商品作为资本的价值增殖，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因为商品或货币要使自己的价值发生增殖，成为资本，那它就必须同活劳动进行结合，产生新的商品。而在新商品的新的交换的过程中，它所换得的劳动量，也总是比原有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要大，即是商品自身价值再加上剩余价值。但它并不是针对一般的商品交换来说的。从一般的商品交换来讲，它是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如果商品或货币不是当作资本，而是作为一般商品或货币，那么它在同其他商品交换时，就不会产生一个超过自身价值的余额，即剩余价值。马尔萨斯把一般的商品交换同资本与活劳动的交换等同起来，只是根据商品作为资本，在它与活劳动的交换结合中，换得了它本身的价值加利润这种特殊现象，就断言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所能支配的劳动量决定的。这样一来，剩余价值就成了来自流通领域的让渡利润，不与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发生必然的联系。

马尔萨斯的价值理论绕过来转过去的目的，不过

是回避和否认李嘉图关于劳动决定价值的科学结论，这不仅没有解决李嘉图所遇到的矛盾，而且比李嘉图的理论更落后，是荒谬的、庸俗的价值论。它用供求论同生产费用论的混合，掩盖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贵族和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的实质，其根本目的在于从流通领域中来说明利润的来源，以便为他替土地贵族利益辩护的收入理论和危机理论奠定基础。

马尔萨斯理论的庸俗性不仅表现在他的价值理论上，更主要地表现在他为了达到为土地贵族利益辩护的目的，采取各种极其卑鄙的手段，歪曲事实，否定真理，提出了一套极其露骨地为土地贵族辩护的、也是极其庸俗的收入理论，包括庸俗的土租理论、庸俗的工资理论和庸俗的利润理论。

庸俗的收入理论

马尔萨斯在其庸俗的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收入理论，是他为土地贵族辩护最为露骨的部分，在马尔萨斯整个经济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马尔萨斯对资本主义社会三种收入的研究，是按照地租、工资、利润这个顺序来进行的。从这种研究

顺序看，说明马尔萨斯根本不懂得资本主义社会三种收入的本质和内在联系。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收入，就是雇佣工人在全部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全部价值。其中，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它是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因此，要正确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收入，首先就必须研究工资，确定它在工人所创造的全部价值中所占的份额。只有在工资的份额确定以后，才能确定剩余价值的份额，从而才能在剩余价值的基础上来开展对利润和地租的正确研究。马尔萨斯把工资放在地租之后来研究，完全颠倒了劳动力价值同剩余价值的关系，是十分错误的。同时，从利润和地租的关系来看，地租不过是超额利润的转化形式，是剩余价值超过平均利润以上的余额。因此，在研究利润和地租的时候，如果不事先研究利润问题，地租问题也是不能得到正确说明的。所以要正确地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收入，就必须按照工资、利润、地租的顺序来研究，而不能先研究地租，再来研究工资、利润。

马尔萨斯之所采取这样的研究方式，其目的在于更有利地为土地贵族辩护，证明土地贵族所获取的地租是正当的、必要的，为此就必须割断地租同其他两种收入的内在联系。事实上，他在价值理论中所提出

用购买劳动来决定商品价值，把利润(剩余价值)同耗费劳动对立起来的观点，就是为他运用这样一个研究顺序奠定基础的。而他提出的“第三者理论”，又是他按这种顺序来研究三种收入的必然结果。可见，按照地租、工资、利润的顺序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三种收入的问题，并不是马尔萨斯研究中偶而出现的错误，而是他精心设计的一个为土地贵族的利益辩护的庸俗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由他的阶级本质决定的。

马尔萨斯的地租理论是他为地主阶级效劳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本任务是为土地贵族获取地租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进行辩护。

由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因拿破仑战争，支援盟国，谷物价格上涨，工人的实际工资受到影响，生活水平显著下降。为了生存，工人的反抗斗争彼伏此起，使得工厂主难以压低工资。谷物价格上涨和工人工资的增加，影响了资本家的利润率，使他们难以获取更大利润。而地租则因谷物价格高涨而上升，地主坐享地租增加的利益。因此产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便在经济利益上发生尖锐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地租问题很自然地成了社会各阶级攻击土地贵族的主要目标。在经济学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再攻击地主阶级的地租收入，出现了反对土地贵族的地租理论。

1814年，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大卫·布哈南(1779 - 1848)在他发行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中，就以注释和附录的形式指出：地租是土地贵族对土地实行垄断而产生的不正当收入，是对消费者的剥夺；地租并不增加国民财富，只不过把社会财富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里，或者说，是把财富从消费者手里夺来交给地主。所以地租的增加是社会的损失，它是对消费者的一种剥夺，即地主之所得是消费者之所失。尽管布哈南把地租归结为垄断价格的结果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他却代表了当时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土地贵族的一种进步要求，因而对社会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土地贵族辩护士的马尔萨斯，当然是不能袖手旁观的。于是他很快于1815年就发表了《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的研究》，企图以地租来源于“自然”的观点来驳倒布哈南，给土地贵族解围，基本上形成了他的地租理论。然而刚刚隔了两年，李嘉图又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运用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来研究了地租问题。他指出，地租并非来源于自然，而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它是由农业资本家获得的超过平均利润以上的那一部分超额利润转化而来的。这样，李嘉图就比较清楚地说明了级差地租的性质和来源，揭示了地主的利益和其他任何阶级在利益上的对

立关系，指出土地贵族是雄蜂和寄生虫。李嘉图的这个地租理论比布哈南的地租理论要科学得多、深刻得多。因此，马尔萨斯为了能够驳倒李嘉图的地租理论，首先就必须推翻他的劳动价值论。这样，马尔萨斯在1820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首先是“批判”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说，接着就搬出了他那为土地贵族辩护的地租理论。他的地租理论与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是势不两立的。他站在土地贵族立场上，用心良苦地要证明地租是地主的社会正当收入，地主阶级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

马尔萨斯的地租学说主要想阐明：是否地租像亚当·斯密所说的是一种垄断收入。在论证这个问题时，其主要观点是从安德森著作中剽窃来的。1777年安德森在爱丁堡出版了《关于谷物条例性质的研究》一书，在谈到地租问题时，以在不同程度的有利生产条件下生产出来的等量产品是有一定的、同一的市场价格为前提，说明了地租等于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产品的平均价格的余额。如果土地特别贫瘠，这种土地的产品同产品的市场价格一致那么这余额就没有了，就是说，形成地租的基金就不存在了。他认为任何国家，土地肥沃程度优劣不齐，由于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必须耕作劣等地以满足。但其先决条件是：市场谷物价格必须上涨到足以支付劣等地的生产

费用。这样优等地的农作物就有一个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额，想耕种优等地者就不能不付出相当代价作为报酬，酬金高低决定于土地的相对肥沃程度。所谓地租，就是优等地所得的酬金，它随人口的增加而增大。由于安德森阐明了级差地租的基本特点，被马克思称为近代地租学说的真正发现者。

马尔萨斯抄袭了安德森的基本观点，在《地租性质与发展的研究》小册子中，首先竭力证明，地租并不像亚当·斯密等人所说的是垄断价格的结果，而是“总产品价值中扣除各种耕种费用后归于地主的部分”，“或者用货币来计算，是总产品价格中扣除劳动工资和耕种投资利润后的剩余部分，”也就是说，是市场价格经常超过优等地的生产费用的剩余，是一种剩余产品，因而实际上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对人类的恩惠。那么在农产品的价格中，为什么会存在这个剩余部分，或者说地租为什么会产生呢？

马尔萨斯认为地租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主要的是土地的性质。土地能够生产出比维持耕种者的需要还多的生活必需品。由此形成的地租是“来自神意的丰富礼物”，不是土地垄断的结果。这就把农业的剩余产品从农业工人的剩余劳动分离开，说成“土地的性质”带来的。

第二，土地产品所特有的性质。土地生产出来的

产品与其他产品不同，它是生活必需品，能够不断创造出对它自身的需求，或者能够按其生产量的多寡而养活若干的需求者，这是使土地产品的价格能够支付地租的条件。马尔萨斯认为生活资料与人口增长，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生活资料增加，人口必然增加，而人口的增长，势必提出对生活资料的更多需求，所以说农副产品可以不断产生出对它自身的需求。其他产品如果生产过多，其价格就会因供过于求而下降，从而也就不会形成产品价值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相反，土地产品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由于人口增加更需要食物的供给，于是价格就上涨到它的成本以上，从而创造了一个剩余，马尔萨斯断言这是自然规律支配下的社会进步固有的现象。

第三，肥沃土地相对稀少，不足以满足我们的全部需要；又由于农业上的收益递减，不得不耕作次等土地，于是优等地产生了地租。

在马尔萨斯看来，地租完全来源于土地本身，他十分自信地说：“我曾把这种剩余叫做上帝的恩赐，并且我坚决地认为这个名称是十分恰当的”。土地产品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部分的地租，是必须交纳给地主的，这是由“肥沃土地的相对稀少性”决定的。如果不把它交纳给地主，而把它仍然以工资利润的形式分配给作为土地耕种者的工人和资本家，那就只有最

优等的土地才能加以利用，其他的次等以下的土地就不会被改良和耕种。因为这些土地的肥力都不及最优等的土地，不能提供与最优等土地相当的工资和利润。但是一个国家的最优等土地又是稀少的，如果只耕种这种土地就不能使这个国家的资本和人口得到增加。因此，为了适应资本和人口迅速增长的需要，把这个剩余部分作为地租从工资和利润中分离出来交给地主所有，这既是绝对必要的，同时也是资本和人口增加的自然和无可避免的结果。在分析这个问题时，他运用从安德森那里抄袭来的级差地租理论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考察了级差地租的两种形式。

马尔萨斯认为，在肥沃土地非常多，任何人只要感到需要就可以获得这种土地的时候，是不会有人向地主支付地租的。但是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肥沃的土地总是稀少的。当资本增加到所有土质最肥沃、地位最有利的优等土地都耕种完毕以后，继续在这种土地上追加资本，必然会因土地肥力的递减而引起利润下降。与此同时，人口的增加又必然会使劳动工资下降。然而工资和利润都是农产品的生产费用的要素，因此它们的下降也就意味着生产费用的下降。农产品和生产费用下降了，但是，它的价格不但不会下降，而且还会因人口的增加而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粮食的价值就会超过作为供给

条件的工资和利润的价值：这种超过部分就是土地总剩余产品中叫做地租的部分。” 马尔萨斯这里所说的地租，实际上就是指同一块土地上连续追加投资的各个资本，由于生产率不同而引起的地租，即级差地租。

至于级差地租，马尔萨斯是从级差地租引出来的。他说：“当资本的积累达到使优等土地上追加资本的报酬低于在次等土地上的投资所得时，显然资本一定会用于耕种这种次等土地”。如果耕种次等土地的投资利润是30%，旧土地的投资利润是40%，那么这10%的差额，显然总是属于地租，即级差地租。

马尔萨斯在说明了地租产生的必然性之后，又考察了地租所以不断上涨的原因。在这里，他针对李嘉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地租上涨于社会有害的观点，力图证明地租上涨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并公开地为土地贵族辩护。

在马尔萨斯看来，地租上涨的原因有四个方面：

- 第一、资本的积累，使利润下降；
- 第二、人口的增多，使谷物工资下降；
- 第三、农业改良或劳动生产率提高，使需要的劳动人数减少，从而降低生产费用；
- 第四、农产品的需求的增加，促使价格上涨。

他认为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这 4 个原因中的一个或多个起作用，使生产手段变得相对低廉，使农产品价格和耕种费用之间的差额扩大，地租就自然而然地上涨。但同时，马尔萨斯又认为，由于资本积累的增加，必然会促使资本转向肥力较次的土地，有利于荒地的开垦和利用；谷物工资的降低，又使得同量的谷物可以雇请更多的工人，这样，过去不能耕种的土地现在也可以耕种了；而农业上的各种改革，既利于新地的垦种，也有利于在旧耕地上进行更有成效的耕种，这些都必然会增加市场的谷物供应，保证社会发展的需要。至于因需求增加而引起的谷物价格上涨，马尔萨斯认为这会给农业的改良带来巨大的刺激，从而鼓励资本在新土地上的投资和促进旧土地的生产力的提高。总之，马尔萨斯认为地租的上涨，不仅使地主获得了利益，而且也会使整个国家富裕起来。地租上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也是国家繁荣和财富增长的“最确定的标志”。因此，他说：“我们必须承认，地主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是分不开的。”而如果像李嘉图所说的那样：“‘地主的利益总是同消费者和制造商的利益对立的’，就是说，和国内所有阶级对立的”。“那就可以非常妥当地说，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一个阶级的利益像地主阶级的利益那样，和国家的繁荣富强紧密地必然地联系在一起”。

马尔萨斯把地租的来源归之于自然的恩赐，这就一箭双雕地攻击了布哈南和李嘉图的观点。它既与土地垄断无关，也不是农业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从而既否定了地主阶级与广大消费者的矛盾，也否认了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剩余价值的矛盾，而且地租的增加还是国家昌盛的标志。作为一个道道地地的土地贵族的辩护士，在他的地租学说中可算是暴露无遗了。

但无论他作如何巧妙的辩解，他的地租理论的错误是无法改变的，从而决定了他的辩解是荒谬的、强词夺理的。首先，他的地租理论的一个最主要的错误，就是歪曲了地租的来源和本质，掩盖了农业工人、农业资本家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相互对立关系。一切地租都是剩余价值，都是工人剩余劳动的产物。资本主义地租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地主阶级的一种特殊收入，是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它来源于农业工人的剩余劳动，最初表现为农业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额利润。只是由于土地私有权的存在，它才落到地主阶级的手中，成了地主阶级不劳而获的一种寄生收入。因此资本主义地租，既反映了地主阶级和农业资本家对农业工人的共同剥削，也反映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瓜分剩余价值的斗争。

其次，马尔萨斯从级差地租 来引出级差地租

的理论也是错误的，颠倒了级差地租两种形式的正确关系。实际上，级差地租Ⅱ的基础和出发点是级差地租Ⅰ。不仅从历史上看级差地租Ⅱ要先于级差地租Ⅰ的基础。要说明级差地租Ⅱ，就必须先分析级差地租Ⅰ。只有把级差地租Ⅰ搞清楚了，级差地租Ⅱ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论说明。而马尔萨斯恰恰把这个关系颠倒过来，所以他对级差地租Ⅱ的分析是不清楚的。而且他的地租理论是建立在错误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基础上的。在这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既是他这个错误的原因，也是这个错误的结果。因为正是由于他一开始就把“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作为自己既定的理论前提，所以就必然要以资本在同一块土地(最优等地)上连续追加投资引起报酬减少，利润下降，来说明由扩大耕地面积而产生的级差地租Ⅱ。在颠倒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的基础上来分析级差地租Ⅱ，因此他也就必然要以“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作为分析的基础，其理论前提是错误的。所以，马尔萨斯从级差地租Ⅱ来引出级差地租Ⅰ的错误，是一个双重性错误。

再次，马尔萨斯关于地租上涨原因的论述也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的实质在于否定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对于生产力的阻碍作用，从而进一步掩盖了资本主义农业中的阶级对立关系。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地租膨大起来的原因，就是地主尽可能地缩短土地的租约，

以便在重新订立租约时，把资本家用于改良土地而合并到土地中去的资本的利息，加入到真正的地租中去。因此，资本主义地租的不断上涨，标志着资本主义农业中各阶级之间，特别是地主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增长。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订立租约问题上的矛盾，即地主主要尽量缩短租约期，而农业资本家又要尽量延长租约期。这种矛盾说明了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已经限制了农业资本家对土地的合理使用和改良，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地租增长的这个本质原因，马尔萨斯未作任何分析，而只是在什么“资本增长”、“人口增长”等现象问题上转来转去。因此，他所提出的地租上涨的理论，除了为土地贵族的利益进行辩护以外，是没有什么科学价值的。

马尔萨斯在他的地租理论中，证明了地主阶级收取地租的必要性，接着在他的工资理论、利润理论中证明地主阶级花费这个地租的必要性。

在工资问题上，马尔萨斯力图用其庸俗的价值理论来证明工资就是劳动的价值。在他看来，所谓工资就是劳动的价格，是对劳动者的努力的报酬。

马尔萨斯所说的劳动价格，实际上是由劳动的供给和有效需求经常保持一致时的一种价格。他当劳动的供给不足以满足对劳动的有效需求时，工资就会上

涨，劳动者就能获得较多的生活资料，而生活资料的充裕，就会刺激劳动人口的增长。而劳动人口的增长就增加了劳动的供给，促使劳动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这时工资就会下降。而工资下降，就意味着劳动者获得的生活资料减少，这又必然限制劳动人口的繁殖，减少劳动的供给，促使工资的提高。这样，周而复始，就使劳动者的工资，始终保持在劳动的“价值”这个水平上。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马尔萨斯又从劳动维持基金说的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他把工资区分为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名义工资由货币构成，实际工资由劳动者的货币工资所能购买到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奢侈品构成。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完全决定于和劳动供求对比的这些物品的供求情况。”他认为工人工资的高低与人口和维持工人生活的工资维持金紧密相关。“持续的和巨大的劳动需求对人口的迅速增长是十分必要的；它的增长的速度是和起因于资本或年收入的实际用来维持劳动的基金的数量与价值增长成正比例的。”什么是劳动维持基金呢？“这些维持基金主要是生活必需品，或者劳动阶级用以换取食物、衣着、居住、燃料的手段。”马尔萨斯的“工资维持基金说”对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影响很大，被发展为“工资基金说”。

在马尔萨斯看来，劳动的供给，表现为劳动者人

数的数量；劳动的有效需求，则表现为劳动的维持基金总额。而这个劳动维持基金是不变化的，“停滞不前的，不增也不减”。因此供求关系调节工资在这里也就表现为劳动的供给如何围绕着劳动维持基金而上下波动的问题。如果劳动供给增加了，那么每个劳动者在劳动维持基金中所占的比例就会下降，即工资下降，反之，劳动者人数减少了，工资就会上升。但是，不论对劳动的有效需求怎样，一般说来，劳动的货币价格显然一定会和劳动维持基金的价格相称，使所需的供给得以实现。可见，马尔萨斯是把劳动维持基金作为社会所需劳动的“价值”总和来看待的。也就是说，劳动维持基金是调节劳动供给的尺度。不论劳动的供给和需求怎样变化，由于供求原理的“经常起作用”，就使得工资能始终保持在劳动“价值”的水平上。因为“劳动的维持基金是停滞不前的，不增也不减，因此供求原则将经常起作用，使那种会引起人口增减变化的工资不能出现”。这就是马尔萨斯论证的工资变动规律。

马尔萨斯把劳动维持基金作为社会所需劳动总量的价值代表，其目的就是企图以此证明劳动者的工资是按劳动的价值来支付的，并未受到剥削。他们的工资下降，生活贫困等等，都不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而是由于他们自己生活习惯差，缺乏理智，不能瞻前

顾后，不能自己尊重自己，以至不顾体面地结婚、生育，从而造成人口增长超过劳动维持基金或生活必需品增长的结果。可见，马尔萨斯处处不忘他的阶级立场。

马尔萨斯的工资理论是十分错误的、荒谬的。这表现在，一是工资定义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的工资不是劳动的报酬，也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劳动力和劳动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劳动力是蕴藏在工人身体中的一种生产能力；而劳动则是一个过程，即劳动力的使用过程，商品的生产过程。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也就是把自己的劳动力的使用权转让给资本家，由资本家去使用和支配。而资本家为了获得这个劳动力的使用权和支配权，就必须支付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工人的工资。因而，工资是资本家为了获得劳动力的使用权而支付给工人的代价，它是劳动力的价值。作为工资的劳动力价值只占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全部价值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马尔萨斯没有弄清楚劳动力和劳动的区别，而把工资说成是资本家付给劳动者的劳动的报酬，是劳动的价值，这就歪曲了工资的本质，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同时，他提出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价格才是劳动的自然价格(即价值)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由于他这种倒因为果的错误，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就被完全掩盖起来了。

二是工资变动规律的理论也是错误的。他将工资总额或劳动维持基金不变、工资变动取决于劳动者人口绝对数的变动作为理论的前提条件，而这两个前提条件都是错误的，因而他的工资变动规律的理论就不能成立。第一，就工资总额或劳动维持基金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常量，而是一个随着资本积累而增加的变量。我们知道，所谓资本积累，就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追加资本，而这一部分剩余价值要转化为资本，就必然要划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可变资本部分相对于不变资本部分来说是很小的，但也不能排除它必须作这种划分，否则它就不能发挥资本的职能。因此，不管追加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如何，这个新的可变资本的形成，就会导致劳动维持基金的增加。这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规律决定的。所以马尔萨斯关于劳动维持基金“不增也不减”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第二，工人工资水平的变动，也不取决于工人人口绝对数的变动，而是取决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变动。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它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正是由于这个不受人口实际增长限制而又绝对地隶属于资本的产业后备军的存

在，使资本主义在经济繁荣时，照样可以获得廉价的劳动力，而在危机时期，又可以压低劳动力的价值。所以它是调节工人工资变动的调节器。但是，马尔萨斯却认为工资是由工人人口绝对数的变动来决定的。实际上他的这个观点是以他的人口论为依据的。如果真的按照他这个观点，那末资本家在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就绝对不可能及时地获得劳动力，而不管他把工资提高到什么程度。因为任何一个劳动力的成长，都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并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办到的。所以马尔萨斯的这个观点除了说明工人阶级的贫困是由于他们生育过多以外，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

马尔萨斯的利润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庸俗价值基础上的一种“让渡利润论”。这个理论，从它否定利润来源于剩余劳动方面讲，是为资产阶级的剥削辩护的理论；从马尔萨斯整个庸俗经济学体系来讲，它是为他替土地贵族辩护的危机学说提供理论前提。

马尔萨斯对利润问题的研究是从歪曲利润的本质开始的。他认为所谓利润，就是在“国民所得中作为资本的报酬归于资本家的部分”。他看来，资本家的资本，由于它在生产中帮助了劳动者，对生产起了促进作用，因而必须获得足够的报酬，而这个报酬就是利润，它等于商品的价值和生产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各

种垫支的价值的差额。这个差额同各种垫支价值的比例就是利润率。商品价值之所以要大于各种垫支的价值，只是由于“为了构成商品的价值，必须在用在商品上的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上加入不同的利润量和利润率”。就是说，由于在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中加入了一个外在的东西，即利润，因而才使得商品的价值同各种垫支的价值之间形成一个差额(利润)的。但问题是商品已经生产出来，作为一个完整的物质形态，这个利润又是如何加入到商品中去，然后又把它作为利润再收回来呢？这不是在自己哄自己吗？当然马尔萨斯不会这样去表现他的谬论。马尔萨斯说的“加入不同的利润量和利润率”，是把生产出来的商品按照一个比它本身价值大的价格来出售的意思，或者说，利润在于商品贱买贵卖，买者购买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或物化劳动多于卖者为商品所花费的。

按照马尔萨斯所说的，利润既然是由资本对商品实行加价出售的结果，那么是不是就可以随随便便对商品进行加价，达到提高利润的目的呢？要是不能的话，那是什么原因决定和影响利润或利润率呢？在马尔萨斯看来，对商品进行加价来提高利润率要受到种种原因的限制和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最后投放在土地上的资本的生产力；第二是由于偶然的或通常的供求情况而引起的同一数量的劳动的

产品价值的变动。

马尔萨斯认为，最后投放在土地上的资本的生产力之所以能够决定和影响利润率的高低，是由于这种生产力的大小，可以知道在社会总产品的价值中，要用多大一部分来维持雇佣工人的生活，也就是说把工资压低到什么程度为宜。同时，这最后投入耕种的土地的资本利润率，也是一般利润率的最高限度，马尔萨斯把最后投放在土地上的资本的生产力，称为利润的“限制原因”，它“决定利润变动的幅度，说明利润可能上升到多高，下降到多低”，“在任何时期和任何情况下，利润都不可能超过土地状况所容许的限度。”

马尔萨斯把第二个原因，即供求引起产品价值的变动，称为“调节原理”，它是在“限制原理”的作用范围内来发挥其影响和决定利润率的作用的。“限制原理”之所以能影响和决定利润率，是因为“调节原理”（或供求原理）的作用，引起同一劳动的产品价值的变动。而产品价值的变动，又必然会导致利润率的变化。

可见，在利润决定问题上，马尔萨斯既强调“限制原理”，又强调“调节原理”（供求原理）。他强调“限制原理”是为了土地贵族的利益。他等于在向产业资本家宣布道：地租的上升和利润的下降是必然的，是自然规律，是上帝的旨意，你们相信上帝吧，不要

为此不高兴。而他强调“调节原理”(供求原理)又等于安慰产业资本家：利润下降你们不要急，你们还可以借助供求原理的作用来提高资本的利润率，增加自己的利润。

马尔萨斯的理论，是极其荒谬的。首先，他关于利润来源的分析就是十分错误的，因为利润不是来源于流通，而是来源于生产，来源于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根本不理解的就是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总量和商品中所包含的有酬劳动量之间的差额。正是这个差额构成利润的源泉。马尔萨斯之所以不理解利润的真正来源，关键在于他混同了劳动和劳动力。从前面介绍的工资理论中可以看出，马尔萨斯把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看成是劳动，并把工人的工资说成是劳动的价值。因为他认为商品的价值全部都是有酬劳动的价值。这就否定了其中包含的无酬劳动的存在，从而也就否定了利润的真正来源。马尔萨斯认为利润的产生是由于卖者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他企图用价格(即他所说的商品的变动价值)代替价值，把利润归结为流通的观点，来和李嘉图关于利润来源于工人的耗费劳动的观点相对抗。他所说的这个变动价值同生产过程中由耗费劳动决定商品“既定价值”，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因价格不过是价值的表现，它始终是围绕价值波动的。因

此，利润首先来源于商品价值，来源于商品价值中包含的剩余劳动，而不是来源于商品在流通中的高价出售。

其次，马尔萨斯关于利润率下降的理论也是错误的。要分析马尔萨斯的这一错误，我们先来弄清楚资本的构成。资本的构成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从物质形态看，资本是由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所构成，它们之间的比例是由生产的技术水平决定的，这种反映技术水平和劳动力之间的比例，叫做资本的技术构成。另一方面，从价值形态看，由于生产资料的价值表现为不变资本，劳动力的价值表现为可变资本，因而资本又是由一定数量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构成的，它们之间的比例叫做资本的价值构成。资本的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有机联系，资本的价值构成以技术构成为基础，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价值构成。这种由资本的技术构成所决定，并且反映着资本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必然不断改进企业的技术装备，提高劳动生产率，结果在全部资本中，不变资本所占比重增大，可变资本所占比重相对减小，从而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这样，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影响着利润率

的提高或者降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可变资本(活劳动)减少，利润率下降，相反，资本有机构成降低，可变资本增大，利润率上升。因而利润率下降的真正原因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普遍提高，而不是由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引起的劳动生产力下降。也就是说，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普遍提高，使得在一定数量的资本中，用于不变资本(生产资料)部分的价值增大，而用于可变资本(活劳动)部分的价值相对减少，这样，资本所推动的活劳动就相对地减少了。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活劳动的减少，就必然导致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减少，从而引起利润率下降。而马尔萨斯却用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相联系的劳动生产率下降来说明利润率下降，这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贫瘠土地投入耕种，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使得资本的有机构成下降，这正是利润率提高的原因，而不是利润率降低的原因，这种利润率的提高表现为级差地租的上升。所以，马尔萨斯用农业中扩大耕地面积引起的劳动生产率下降来说明利润率下降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这在本质上就是否定地租的剥削性质，是为土地贵族的利益辩护。同时，他用供求关系来决定利润率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供求关系只能说明利润的平均化，说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而决不是决定利润率高高低低的原因。

第五章 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哈叭狗”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理论是凭空出现的。任何一种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为了适应一定阶级或集团的斗争需要而产生的。马尔萨斯出生于英国的土地贵族家庭，他的著作主要反映资产阶级化的土地贵族的利益和要求。他在《人口原理》一书中诡称无产阶级失业、贫困的根源是他们生育过多。他美化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平衡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增长的最有效的制度。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则从分离亚当·斯密经济学说中的庸俗成分，并通过“注释”和“通俗化”的形式来构造一套为土地贵族的利益辩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武断地说不断地扩大土地贵族的个人消费，是使资本主义制度免除经济危机的唯一途径。

在马尔萨斯的思想中，明显地存在着两个特点：在反对工人阶级方面，他积极维护包括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利益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利益，即拥护他们反对人民群众，反对无产阶级；而当土地贵族同工业资产阶级存在利益分歧并且相互敌对的时候，他就

站在土地贵族一边，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由于马尔萨斯的观点非常适合反对当时群众革命斗争的需要，所以博得了英国统治阶级的赞赏。马克思指出：“法国革命在不列颠王国找到了热情的维护者；‘人口原理’是在18世纪逐渐编造出来的，接着在一次巨大的社会危机中被大吹大擂地宣扬为对付孔多塞等人学说的万无一失的解毒剂，英国的寡头政府认为它可以最有效地扑灭了一切追求人类进步的热望，因而报以热情的喝采。”马克思还指出：“这部著作的实际目的，是为了英国政府土地贵族的利益，‘从经济上’证明法国革命及其英国的支持者追求改革的意图是空想。一句话，这是一本歌功颂德的小册子，它维护现有制度，反对历史的发展，而且还为反对革命法国的战争辩护。”

“私有制是最良好的制度”

马尔萨斯认为，财产私有社会制度是由人口自然规律的支配而产生的，是永恒的，不可被消灭的。它是人口增长同生活资料增长之间保持平衡的有效的和最良好的制度。财产私有制是限制人口增长的最有效的办法，它可以使社会避免贫困和罪恶等各种弊病。

他说：所以在各文明国家里，现在所行的相关不很大的财产支配制度，似乎很可以确定为人微言轻最好的（虽然不是充胜任的）良药，来救治这个社会所患的各种弊端。按照马尔萨斯的廉洁，两性间的情欲必然存在，不能消灭，只有财产私有制和婚姻制度使每个人都担负起供养子女的责任，可以使无力抚养子女的人们自制不生出子女来，不致妄行纵欲、生育过多的子女。否则，耻辱和困难必将落到轻率地使自己和他的无辜子女陷入贫困的人身上。他还认为公有制和平等的制度，不能产生使人努力的种种刺激力量，而这种刺激力量乃是克服人类好逸恶劳的天性的唯一手段。而平等的社会、财产公有缺点本身只是一种幻想。如果财产公有制，人们一旦消除了贫困和饥饿的顾虑，人口增殖就会迅速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马尔萨斯说：毫无疑义，维持一个大家庭的困难的考虑而来的对早婚的自然限制，确实是广泛地在每个文明国家的一切社会阶级中起着作用，并在还可以希望由于下层阶级人民在知识和远虑方面不断改进以后，这种限制还能发生更大的效力。但是这种自然限制办法的运行，完全有赖于私有和遗产法律的存在；而在平等制度和财产公有制情况下，这种自然限制的办法只好用某些人为的规章制度来代替了，可是这种人为的规章制度非但是类型大异而且性质也不自然得多。“每一种平等

制度一定很快就会在那种不可避免和必须的贫困和苦难中消亡，除非这样的人口增长受到抑制，不过这种抑制手段比由私有财产法律以及上苍和自然所加在每个人身上的抚养自己子女的道德责任所造成的手段还要残酷数倍”。可见，马尔萨斯反对社会改革，咒骂和攻击平等社会和财产公有制度到了什么程度。他一贯地毫不掩饰地为私有制度唱颂歌，不仅认为私有制是限制人口增长的最有效的制度，而且是发展人类智力和智慧，培养和提高人类德性的最良好的制度。他说：“不平等的社会状态化善良行为提供自然的报酬，并广泛地普遍地使每个人都希望在社会里往上升，而害怕沦落。这种社会形态无疑是发挥人的能力和智慧，并且是有利于人类品德的全面改进的。”可见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要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人口自然规律最有效的最美好的永恒的社会制度。

马尔萨斯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一方面又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攻击。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失业、贫困和苦难，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造成的，而是人口自然规律、人类的本性所造成的结果，是命中注定而不可改变的。他反对葛德文所提出的私有制是人类社会失业、贫困和罪恶产生的根源的观点。他说：“葛德文先生在他的全部著作里所犯的重大错误是将人类社会里所难免的一切罪恶和贫困，几乎都归

咎于社会制度。他认为一切的政治法规和由来已久的财产所有制度是万恶之源，亦即使人类堕落的一切罪恶的温床。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那末从这个世界里肃清一切祸害，看来不是一件绝对没有希望的事；因为理性似乎就是完成这样一个伟大任务的适当而胜任的工具。但是，事实往往却是如此：虽然社会制度好像是，并且实在也是，危害社会的极其明显而使人不能不相信的原因，但是这种原因，如果和自然规律及人类情欲所造成的祸害的更为根深蒂固的原因比较起来，实在是微乎其微，并且仅仅是表面上的原因。”

马尔萨斯认为，任何幻想平等，任何大规模的农业条例，都不能免除人口规律的压力。“要社会上全体人的生活，都安逸、幸福，而比较闲暇，不必悬念自身及家属的生活资料如何供给，那是无论如何亦不可能”。所以马尔萨斯把葛德文等人描绘的平等社会看成是“黄粱一梦”，“想象中的一幅幻景”，永远不会到来的。在马尔萨斯看来，废除了财产私有制度，实行婚姻自由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消除了贫穷与罪恶，势必刺激人口迅速增长。而生活资料的增长总是有限度的，低于人口增长速度的，所以即使建立起了这种美好的平等的社会制度也必然很快趋于土崩瓦解。马尔萨斯说：“这种幸福而不朽的‘琼楼玉宇’，这些真理和美德的‘圣殿’，当我们清醒来回到现实生活，

并思虑人生在世的实际处境的时候，就会像‘泡影’一样消灭于无形”。

马尔萨斯从他所维护的阶级的利益出发，极端仇视工人和劳动群众。更有甚者，他把反抗地主和资本家剥削的工人和农民诬蔑为“暴民”。“暴民是一切摧毁自由的恶魔中最凶猛的。所谓暴民，一般地说，就是多余人口的产物”。如果暴民起来革命的话，“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结果，必然是不断的变更和不停的屠杀，而只有建立一种绝对专政制度才能把这种血腥斗争制止”。“所以，下层阶级接受痛苦的压迫，并且一贯地把他们的痛苦归咎于他们的统治者，照我看来，似乎就是专制制度的基石，它的堡垒与护身符”。马尔萨斯毫不掩饰他仇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反动立场，他“宁愿屈服于强大的压力而绝不支持民众的暴动”，所以他主张对工人和农民和革命行为实行坚决镇压和不停的屠杀。英国劳动阶级因而十分憎恶马尔萨斯，咒骂马尔萨斯是“卖假膏药的牧师”，是“敌人的辩护者”。而地主资本家和形形色色的反动派却把他捧上了天把他的《人口原理》一书奉为反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圣经”。恩格斯严正地指出：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

毋庸置疑，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的反动性是极其

明显的。马克思在提示资本主义人口规律时指出：“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类干涉的动植物界。”资本主义大批的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是资本主义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发生作用的直接后果。在这里随着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量的增长程度的提高，随着生产规模和雇佣工人阶级的扩大，随着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财富更加增长。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迅速加快，资本对工人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相结合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因此从工人人口本身在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过剩的工人人口是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必然产物，但它又是资本积累的杠杆，甚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现象，绝不是像马尔萨斯所说的那样，是工人人口繁殖过快，消费资料供应不足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劳动者却腰缠万贯、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而创造财富的人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人类极端不公平的现象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邪恶制度的结果。

“济贫法是一种使国家破产的制度”

马尔萨斯从他的人口原理出发，极力反对当时英国实行的济贫法，力图论证济贫法有害无益，是一种使国家破产的制度。

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为了使因圈地运动失去土地、家园而无家可归的农民不致于到处流浪，于是把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以保资本家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因此颁布了济贫法。具体实施办法是：责成教区对贫苦的工人进行救济；征收济贫捐；举行法律规定的慈善事业。按济贫法规定每个穷人可以在其出生的教区领取一定数量的货币和实物救济。可是，经过200多年后，到18世纪下半期，在失业人数激增和面包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旧的济贫法已经不符合资产阶级利益。于是1795年英国开始广泛实施斯干汉姆斯制度，规定根据面包价格上涨的比例，每个“贫穷而勤勉的”人可以从济贫税中取得救济金。这规定使资本家能够把一部分工资负担转嫁给纳税人，因此它实际上起了鼓励资本家降低工资的作用，结果使贫民数量更为增加。18世纪末，产业后备军已经形成，资本家可以从市场获廉价的劳动力，济贫法已失去了它的作用。这时资本家就撕去了伪装的慈善家

面孔，露出了狰狞的真面目，攻击劳动人民，极力反对济贫法。对于资本家来说，现在已经不是需要消灭赤贫了，而是需要它万古长存。马尔萨斯适应资本家们的这种需要，意图反对济贫法。

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第一版第五章中认为，济贫法只能使人懒惰、浪费，增加更多的过剩人口，促使粮食价格上涨，劳动力实际价格下降，减低人民的储蓄能力和储蓄意愿，不是为人类造福，而是给社会带来不可救药的弊病。他认为英国的济贫法往往使人口趋于增长，而养活人口的食物却不见增加。穷人明知无力养家糊口，也要结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济贫法在产生它所养活的穷人、创造穷人。人口增加了，而国内的食物不按比例增加，每个人的特许权的价值将降低。分配给每个人的食物数量必将减少，一天劳动所能购买到的食物数量也随之减少，他们之中必然有更多的人请求救助。因此没有济贫法，人民得到的才会多。他公开宣称：作为一种普遍通行的制度，济贫法确定是建立在完全错误的基础之上的。

他又认为，济贫院收容的人一般不能说是最有价值的社会成员，但他们消费的食物却会减少更为勤劳、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本应享有的食物份额，因而同样也会迫使更多的人依赖救济为生。如果让济贫院中的穷人比现在生活得好，则货币分配的这种变化将使食

物价格上涨，将更为明显地使济贫院外的穷人的生活境况恶化。他还说，下层阶级的贫乏是根深蒂固的弊害，非人类智力所能疗治。他说应该形成一种风气，把没有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看作是一种耻辱。如果某些人根本没有可能自立，根本不可能养家糊口，只因可以指望得到教区施舍，便结婚成家，那这些人就是受了不正当的诱惑，不仅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幸，生活不能自立，而且还会不知不觉地损害同阶级的所有其他成员。一个不能养家糊口而结婚的劳动者，在某些方面可说是他所有劳动伙伴的敌人。

马尔萨斯提出了废除济贫法后的缓和社会矛盾的办法，一是废除教区法，给予英国农民行动自由，使他们可选择工作的机会较多、劳动价格降低；二是开发新的耕地，增加农业的产品，降低工资；三是设立济贫院，收容贫民。济贫院提供的饮食应该粗劣，其所收容的穷人凡能工作者都强迫工作。1834年英国实行新的济贫法，实际上是采纳了马尔萨斯的主张。新济贫法取消了货币和实物救济，规定贫民只能在设立的习艺所才能得到“赈救”。一切金钱或实物的救济都取消了，只承认一种方式——把穷人收容到已经在各处迅速建立起来的习艺所里去。这种习艺所被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那里的规则，足以吓退每一个还有一点希望可以不要这种社会慈善事业过活的人。

为了使穷人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请求救助，马尔萨斯的信徒们挖空心思地把习艺所变成一处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在习艺所里的贫民担负着繁重的劳动，过着非人的生活。恩格斯当时指出：甚至监狱里一般的伙食也比这里好，因此，住习艺所的人为了能够进监狱，就常常故意犯一点罪。马尔萨斯认为济贫法还会使工资普遍降低和很多工人失业。按照马尔萨斯的看法，维持劳动的基金实际是不变的，工资高低决定于工资基金的多寡，救济法会助长人口增加，同时使在乡村靠津贴抚养起来的人口自然并且必然地流行到城市去。劳动的供给超过对它的需求，就会导致降工资。劳动供大于求，要获得充分就业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此外马尔萨斯还从多方面论证救济法有百害而无一利。他的主导思想是穷人没有被救济的权利，贫民是他自身贫困的原因，救济手段在他们自己手上，而在别人那里，政治和社会对此无能为力的。实行救济法，只会制造更多贫民，使物价上涨，工资下降，社会各阶级生活普遍下降，人口增加。由于不具备有效需求，所以也不能刺激生产发展，反而会阻碍生产的发展。因此马尔萨斯坚决主张废除济贫法。

土地贵族的孝子贤孙

19世纪20年代，萨伊、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等人否认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理由是商品与商品相交换，无异于商品以商品来购买，买和卖是均衡的，供给和需求也是平衡的，所以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马尔萨斯驳斥了这种错误理论，认为商品同商品交换的理论是错误的。他说：“事实上，商品决不都是和商品交换，很多商品是直接和生产性劳动或私人服务相交换的。显然，这很多的商品，和它们所要交换的劳动比较起来，它们的价值可能因过剩而下跌，正像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与劳动或货币比较起来，会因供给过剩而下跌一样。”马尔萨斯正确地认为把商品交换简化为物物交换，毫无根据地把货币抽象掉是没有道理的，譬如说：“当一啤酒花种植者运1万袋啤酒花到威希尔市场上去时，他决不会想到帽与鞋的供应情况，正像他不会想到太阳上的黑子一样。那么他想到的究竟是什么？他想用啤酒花换什么呢？穆勒先生的意见似乎是：如果说他所需要的是货币，那就说明说话的人对政治经济学一窍不通。然而我个人宁可让人说成一窍不通，也仍然毫不犹豫地明确指出，他所需要的的确是货币；并且还要说，在

目前的社会状况下，他送上市场进行交换的大宗商品必须换取货币，否则他就不能进行他的啤酒花种植。”因此他认为在消费和生产、需求和供给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将导致生产过剩危机的发生。

马尔萨斯从西斯蒙第那里抄来了“消费不足”的危机的观点，反对李嘉图、萨伊等人否认危机的看法，但他承认危机的目的却与西斯蒙第完全不同。西斯蒙第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和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在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中，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各生产者之间完全受自由竞争的支配，使用机器进行生产，企业不断集中，这一切都造成了生产的无限扩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又使得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生产劳动者却收入不足，日益贫困。这样就破坏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比例，缩小了国内市场，使产品实现遇到了严重的障碍，因而必然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但马尔萨斯作为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辩护人，掩饰和抹杀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他的天职。他提及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矛盾、需求和供给的矛盾，但并不批判它。其目的在于证明土地贵族、国王、神甫，以及形形色色的寄生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极端重要性。他断言，正是他们只买

不卖，只需求而不供给，才使商品、利润得以实现。这样一来马尔萨斯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吹捧土地贵族，论证土地贵族和地租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因此，必须有一个相当大的阶级，他们愿意也能够消费掉比他们所生产的数量更多的物质财富，否则商人阶级就不能继续有利地生产多于他们所消费的数量。在这个阶级中，地主无疑地居于显著的地位；但是，假如地主没有他们所养活的大批从事私人服务的人手的帮助，单靠他们自己的消费就不足以保持和增加产品的价值，并且不能使产品数量的增加足以抵消其价格的下降而有余。”如何解决有效需求的问题，也就是消除生产过剩的危机问题。

马尔萨斯认为要促进生产的持续发展，保证财富的不断增长，就必须经常保持足够的有效需求。在马尔萨斯看来，单纯的社会生产力，是不能刺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的。他认为就财富的生产来说，“最有利的三种重大因素是：资本的积累、土地的肥力和节约劳动的新发明”。但这三大因素能够便利生产，增加供给，然而却不能对需求提供刺激，它们与需求无关。增大的供给没有与之相适应的需求增加，就会出现供给超过需求而引起产品价格下降，使资本家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利润，这样生产就不能持续地按比例发展，并往往会造成产品过剩，发生生产过剩危机，

阻碍财富的增长。因此，必须提高对产品的有效需求。马尔萨斯指出：“对于决定于分配的产品价值的增加，最有利的因素是：(1)地产的分割；(2)国内和国外贸易；(3)使社会中占适当比例的一部分人从事于私人服务，或者可能以其他方式提出对物质产品的需求，而不直接参与产品的供给。”在这里的第一条措施是土地财产的分割，就是要巩固资本主义的土地私有制。在马尔萨斯看来，土地如果像封建时代那样集中，或者像法国那样分割成小农经济，都是于有效需求的增加十分不利的，因此，英国的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应当很好地巩固下来。可见它是直接保护土地贵族的利益的。第二条意思是说发展国内外商业可以增加社会对商品的有效需求。土地贵族可以因此享用各种各样的奢侈品。在以上三个能增大有效需求的原因中，他特别重视的是第三个原因，其目的在于说明在财富增长过程中，只从事消费而不生产的阶级的存在和发展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而且在马尔萨斯看来，应当尽量的扩大他们的这种个人消费，不然经济危机就要爆发，资本家就要遭到损失，甚至破产。

马尔萨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之所以会出现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而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主要原因就是资本积累。因为在他看来，资本积累会使那些本来从事私人服务方面的非生产劳动者变成生产工

人，造成市场上的商品大量增加。但是生产工人的增加并不会引起他们的需求或消费的增加，其原因是这些增加的工人不外是从原来从事私人服务的部门转移过来的。这种转移不会增加他们的总数。因此对社会来说，总劳动维持基金是不会变化的。然而就资本家和地主来说，由于积累，削减了个人消费，因此他们的有效需求显然是下降的。这种下降使得增加工人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找不到买主，导致普遍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必然发生。他说：“由于资本积累，本来从事私人服务的人转变为生产性劳动者，于是，市场上各种商品的数量显然会异常地增加，可是两类劳动者的意愿和能力根据假定是下降的，这样与劳动比较的商品价值就必然会降低，以致大大地降低利润，因而暂时抑制进一步的生产。这正是过剩这个名词的含义，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过剩显然是普遍的而不是局部的。”因此，资本积累不会被利润率的下降自动限制，“过度热心的积累，必然不可避免地导致商品的供给超过社会结构和习惯所允许的消费。”认为，由于过度的积累降低了对商品的有效需求，才破坏了生产的动机。他同意李嘉图的意见，食物的成本上涨，通过影响工资，会逐渐削减利润，因为工资和利润是相反方向的变动。但是解释商品过剩的现象，必须根据短期利润变动的理论来论证。他认为当利润率上升

时，将出现一种积累量大、消费量减少的趋势。增加的积累虽然将会使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受到雇佣，从而较多的商品将可供购买，但因为短期内人数不变，又因为要弄清楚消费习惯需要时间，消费品的有效需求抵消不了由于资本家和其他有钱人的积累或储蓄所造成的有效需求的下降。结果商品只能按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降低了利润，最后破坏了积累或储蓄能力。

从增加有效需求的 3 个因素看，他认为资本积累增加的财富，不能由生产者增加消费来实现，因为这会导致生产费用提高，利润下降，从而减少或消灭资本积累的动机。也不能由资本家来消费，因为他们的欲望是资本积累。

马尔萨斯强调，要维持适当水平的有效需求，单靠工人和资本家的支出是无能为力的，特别是工资冲击着利润，而资本家对积累的兴趣，总是大于购买消费品的兴趣，于是生产力随着储蓄的增加而扩大，更恶化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由此马尔萨斯提出食利阶级和其他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阶级对维持有效需求的重要性。认为他们属于只买不卖的阶级，对消除生产过剩可以作出贡献。特别是地租是来自土地级差的剩余，出自这种收入的支出，只增加有效需求，而不增加生产成本。

此外，他还指出，还有一批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阶级，如卑贱的奴仆、政治家、医生、法官、律师、僧侣等，他们的支出也增加了有效需求，抵消了由于积累过程所产生的消费不足。马尔萨斯由此向社会证明，一批不劳而获的地主阶级及其他寄生阶级，是绝对不可少的，这些人不仅不是社会的累赘，而且还成了“功臣”，应该让它呼奴使婢，任意挥霍，尽情享受，不然的话，社会就会遭到劫难！不仅如此，就连土地贵族的地租收入，马尔萨斯也是吹得神乎其神，他说：“事实上，没有这一部分，就没有城市、没有陆军、没有海军、没有艺术、没有文化、没有精良的工艺品、没有来自外国的便利品和奢侈品，也就没有那种不仅使个人高尚和尊严，而且使全体人民蒙受其利的文明而优美的社会”。非生产性的消费是社会的安全阀，没有它，商品过剩和资本过剩的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这就是马尔萨斯为什么要承认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马尔萨斯明明白白为大土地所有者等寄生阶级辩护。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并不打算掩盖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相反，他是想要突出这些矛盾，以便一方面证明工人阶级的贫困是必要的（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他们的贫困确实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向资本家证明，为了给他们出卖的商品创造足够的需求，养成脑满肠肥的僧侣和官吏是必不可缺的。”

马尔萨斯的观点说穿了非常可笑。他说的这些不生产的消费者究竟用什么来购买商品呢？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他们不过是以地租及租税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生产物价值的一部分，然后再用这部分价值在等价以上去交换资本家的生产物，全部利润就得到实现。这等于是说，一个人生产出来的商品没有人来买时，他应该先付钱给别人，然后叫别人再用这个钱来买他的商品。可见，这种庸俗的辩护性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马尔萨斯有效需求原理，当时没有受到重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出现普遍萧条，才被凯恩斯吸收到他的学说并加以发展，形成消费需求不足理论。从此，“有效需求不足”就被视为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失业和“危机”的根源，他们抹杀了这个“根源”的根源——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

马尔萨斯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但是他把消费不足作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不正确的。消费不足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的经济现象，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存在广大劳动人民的消费不足，但并没有造成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因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治之症，马尔萨斯妄言以

扩大非生产消费的支出来避免它，那完全是一种骗人的鬼话。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马尔萨斯为了维护土地贵族这个没落阶级的既得利益，编造出一套理论，拼命吹捧一群寄生虫，真可谓土地贵族的孝子贤孙。

“寄生虫”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马尔萨斯为土地贵族辩护的立场贯穿于他的整个著说中。在他看来，不劳而获的寄生阶级不仅是避免经济危机发生的“功臣”，而且还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实现经济增长的“功臣”，似乎离开了这群寄生虫们，整个世界就停滞不前了。马尔萨斯的这一观点具体体现在他的经济增长理论中。

马尔萨斯与李嘉图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他区分了“静止局面”和“早熟停滞”。所谓静止局面是指在土地资源衰竭以后所发生的资本和人口出现零增长状态。马尔萨斯认为这是在资源约束下人口和资本动态均衡增长的结果。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人口增长率是工资水平的函数，而资本增长率则是利润的函数；并且，资本与人口相互需求将调节工资与利润，资本和人口不同的增长速度有可能会

成为自身的限制。即是说，当资本增长快于人口时，会形成很大的劳动需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必然导致高工资水平，从而使利润率降低，于是资本积累的动力和源泉逐渐减少；当人口增长超过资本积累速度时，则工资下跌，利润率开始回升，工资下跌到一定程度人口便不再增长。所以，在人口和资本增长过程中，每一种利润率都转化为某一资本增长率，而这一利润率是与一定的人口增长率相联系的；同时，每一种工资率都可以转化为某一特定的人口增长率，而这一工资率又是与一定的资本增长率相对应的。因此，人口与资本彼此协调的均衡增长率只能在运动过程中实现，相对的供求关系变化成为这一过程的动因。最后，“当一国的资本由于积累的不断增进以及可耕地枯竭，而不复增进的时候，资本和利益及劳动报酬必然在长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它们最后都低得不能进一步鼓励资本的增加，也不能进一步对于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维持生活资料为止”。这时，整个经济增长便进入静止局面。

但是，马尔萨斯认为这种局面在任何国家从来没有过，实际上也永远不能达到。在现实的经济增长中，容易发生的是不同于静止局面的“早熟停滞”状况，即在自然资源还没有充分利用时，人口和资本的增长就已受到了抑制，甚至原有的财富和人口都发生显著

衰退的现象。这样，马尔萨斯就把增长过程的停顿分为两类。其一是任何国家，由于获得生活资料的困难最后一定会出现一个比较停滞的时期；其二是由于缺乏有效需求，往往也会造成类似的停滞现象，即“早熟的停滞”，它涉及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处于不发达阶段的国家所出现的“早熟停滞”。马尔萨斯认为当时的波兰就属于这一类型。其特点是国家还处于封建制度统治之下，土地由农奴耕种，劳动产品完全属于农奴主。在这种情况下，“财产所有制和人民的奴役状况对于任何种类的产业都不能起鼓励作用。”并且，剩余产品的分配也极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地主除豢养一大批食客外，就别无其它办法来花掉他们的进款；另一方面，很少有人能够积累新的资本和增加对劳动的需求。所以，国内显然就没有一批人对土地的剩余产品形成充分的需求。于是，潜在的资源长期处于沉睡状态，多少年后依然贫困，人口稀少。马尔萨斯认为这类国家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发展工商业，扩大资本主义部门，从而提高对农产品的有效需求，通过这个过程便可渐渐走出长期停滞的状态。

第二种情况，处于工商业发展阶段的国家出现的“早熟停滞”。其特征是在土地尚未利用，即经济还没有发展到受资源制约的地步，便出现了利润低落，

随之而来产生了对劳动的需求疲软、资本和人口增长日趋缓慢的局面，即“财富的增进——在时期还不成熟的时候就遭到阻碍”。马尔萨斯把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按马尔萨斯的分析，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从事生产性劳动的那些人产生的消费和需求，决不会单独形成积累资本和使用资本的动机；而人口、资本、技术改良、土地资源这些对生产最有利的发展要素只倾向于便利供给，而与需求无关，它们不可能单独地对财富的不断增长提供充分的刺激。由于没有足够的有效需求，经济增长的刺激与来源就难以得到保证。

马尔萨斯认为，为了保证财富的不断增长，生产能力和分配手段必须结合，而分配手段的目的在于达到一种“适度储蓄”。具体说来就是通过三种形式：地产的分割、扩充国内外商业、保护和发展非生产消费来减少储蓄，提高有效需求程度。地产的分割有助于重新分配大土地所有主的收入，从而有可能产生较多的中产阶级，强化消费倾向；国内外商业扩充无疑可以增加社会对产品的需求，刺激消费。而作用最主要的莫过于保护和发展非生产性的消费。这种消费主要以赋税收入为基础。来自利润和地租的赋税，又把购买力直接打入市场，可达到双重效果，“早熟停滞”便得到克服。这说明，马尔萨斯全然低估了资本主

义经济增长过程中必然会发生无法克服的困难。

马尔萨斯尽管意识到总需求不足必然会导致增长过程中断，出现“早熟停滞”，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但他错误地利用这种矛盾来论证一切非生产阶级存在的合理性，以及这些阶级非生产的花费对持久增长的重要性，这充分表明了他为寄生阶级辩护的立场。

除了强调有效需求对经济持久稳定增长的重要性以外，马尔萨斯还提出一种农业、制造业之间平衡增长的观点。

在论述产业平衡问题时，马尔萨斯是在英国的特定背景之下强调产业平衡的。当时英国农业产值尽管在国民经济中居领先地位，但在近50年内已发生大幅度下降；而制造业不论从产值的比重，还是从就业人口所占比例看，进展都十分快。产业资产阶级为了保持工业的高增长，希望从海外获得廉价谷物以降低工资提高利润率，土地贵族则从自身利益出发，反对谷物自由进口，以此来保护日趋没落的农业。马尔萨斯主张产业平衡增长的思想，就成为后者手中的理论武器。

马尔萨斯认为，国内粮食产出决定长期的人口增长。也是其他产业发展的最终限制，因为农业是一个国家长期发展的基础。所以，忽视农业，较多地倚重

制造业、商业，势必影响人口和财富的长期增长。由此，马尔萨斯反对通过对外贸易从各个国家获得粮食维持迅速增加的工业人口，以减轻本国由于土地资源的日趋耗竭而形成的增长制约的观点。他指出，放弃农业、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这样做等于把自身的发展寄托于一个外国农业增长的基础之上。当粮食出口国生产发生萧条、或彼此交换的工业品或农业品之间存在的有利价格比率丧失之时，必然影响到工业国人口和生产的扩张水平，资本和人口的增长也就会趋于停滞。总之，依赖一个不受本国控制的不确定的外部市场会使很大一部分人口“遭受工业国家在商业途径上必然遭到的波动和变化”，只有发展农业，实现本国粮食自给，才是一种可取的方式。

但是马尔萨斯又指出，如果一个国家以农业为主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还必须有与农业规模相适应的工业才行。这是因为尽管粮食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极限是与土地资源耗竭联系在一起，然而土地生产力并不是决定产出量的唯一条件，还必然对农产品有足够的有效的需求，农业产量才可能达到土地生产力允许的最大程度。而工业发展的作用不仅在于可为农业增加资本品的投入，而且更重要的是工业发展起来能够形成一种工农产品之间相互需求。在马尔萨斯看来，通过这一相互需求维持一个稳定或上升的价格水平，对

于保持增长的利润动力十分重要。因此，“每一个领土国家，在它向富庶进展的自然过程中，应当为自己生产工业品。”这样，土地产品就能在国内找到现成的市场；并且这样的一个市场特别有利于资本的不断增长。他还认为，由于工农业“齐头并进”有利于财富的增长，人口增长的极限便可向前推移，从而工农业平衡增长的国家有着和单独发展工业或单独发展农业的国家不同的增长极限。马尔萨斯的这些观点，足以表明他对产业平衡增长的重视程度。

产业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比例或速率才是平衡增长，马尔萨斯并没有明确表达。但他指出，应使“农业与工业并驾齐驱，并使农业与工业两个阶级之间能保持一种更大的平衡”。而且必须使商业和工业方面的人口与农业人口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果再考虑工农业两大部门产品必须形成相互有效需求的观点，马尔萨斯所谓平衡增长就会有工农业之间产值比率不变、增长速度一致的绝对含义。显然，这不符合经济增长的史实。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和人均收入的增长，农业总产值比重必然出现下降。所以现代产业平衡增长无非是指按产品根据各自需求的收入弹性增加产出量。马尔萨斯之所以赋予平衡增长上述含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在于其人口增长的假定：既然劳动人口只要具有糊口水平以上的生活资料就会增长，那么对农产品

的需求就决不会随收入水平上升而缩小。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马尔萨斯确信农业只要在国外谷物不自由进口的情况下，必然会与工业一起平衡增长。由此可见，虽然马尔萨斯的平衡增长的内涵与经济生活必然趋势并不相符，但却是与他的理论体系一致的。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马尔萨斯强调工农业平衡增长，无视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自在转变的事实，并不符合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无非是想通过产业之间的平衡增长，来创造出一种较稳定持久的产出扩张。但是，他是把创造增长刺激的任务放在资产阶级化的土地贵族身上，放在非生产阶级身上，从而使他不可能像李嘉图那样把这种寄生阶级作为社会的赘瘤加以批判。不过，马尔萨斯产业平衡增长思想却为后来强调部门平衡发展对均衡增长起重要作用的发展，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一种早期的理论依据。

第六章 牧师与职业剽窃者

“江湖牧师”

马尔萨斯被英国工人称为“江湖牧师”，原因在于他是极端仇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反动牧师。作为牧师，他在欺骗人、麻醉人方面还是十分称职的。他不在教堂里布道，而且还把牧师的那一套手法用在他的著作中，真可谓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反动牧师。

马尔萨斯从自然神学出发，认为一切动植物都有其存在的目的，人类也一样。人类为了维持生存，具有两个共同的欲望：第一是饮食，第二是结婚；满足了前一欲望之后，后一欲望就极其强烈。但情欲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理智。支配理智的是效用，从而效用也是支配道德的力量，因为道德和理智是一致的。

马尔萨斯从神学观点出发，表示希望最大多数人得到幸福，宁肯多数人中的每一个人有少量的幸福，而不愿少数人中的每一个人有大量的幸福。他认为，造物者是有意地为他的生灵创造幸福的，人的理智必

须认真地实践造物者的规划和安排。同时神要求人类抑制情欲，这样做不仅使个人得到幸福，也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获得幸福。但是马尔萨斯不同意任何一个国家的幸福是由它的人民的数量来衡量的说法，认为人口增加的确是幸福和国家昌盛的象征，但是在幸福的日子随意增加人口，其结果将是灾难。由此，他伪善地表示，希望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几乎看不到赤贫和过依赖生活的人。如果这个愿望得到实现，也就是实现了他所幻想的“人间天堂”。但是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马尔萨斯所倾心维护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就不存在了。如何实现这个“人间天堂”？马尔萨斯从清除罪恶和建立美德着手。在他的“美德”中，对人口的“道德抑制”被称为一项完美无缺的美德，主要依靠它来清除人口过剩的“罪恶”。由此看来，他所要清除的，只是一种“罪恶”——人口过剩，而不是清除每一种罪恶，更不是清除真正的罪恶：人剥削人的制度。

在他臆想的社会里，人口虽然随着食物的增加而有所增加，但是人口必须始终限制在食物所允许的范围内，即人口必须始终与生活资料相适应。这样，工资所代表的价值可能按正常轨道而提高，“所有赤贫现象会从社会上消除，或者至少会限制在少数堕入了不幸的人当中”。他把这些“不幸的人”归之于自然

的原因，不是社会制度的原因。因此他坚决反对贫困是社会制度和法律的责任。

由此，马尔萨斯要人们听命于大自然的安排，以取得幸福，否则就是违反自然的规律，必然受到惩罚。他还冷酷地说，在大自然的盛大的筵席上没有为多余的新来者安排席位。所以他认为“救贫法”是违反自然的。假如穷人知道他不可能从救贫区得到赈济，那么他就会自己帮助自己。国家对穷人只能给予一些医药的帮助，如果给予面包和奶油那就是坏事了；更不可以对成年的健全男女施赠物品，那只会鼓励存心懒惰的人。另一方面，国家应该用教育这种礼物去扶持真正无能力的人，以及真正缺乏知识的人，如此可以消除无知，使弱者变强，以便使他们能够获得就业机会和从过剩人口转变成非过剩人口，有利于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后面这一点，也就是马尔萨斯所说的用“教育这种礼物”去帮助劳动群众摆脱贫困，应该说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为了防止发生革命，马尔萨斯提出：更大的幸福是安全，而不是财富本身；不安全比贫穷更坏。他竭力维护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捍卫传统的英国社会阶级结构，声称一定要保持法律的、社会的和传统的经济现状。当时英国社会在争论“济贫法”、“谷物法

“以及如何维持“有效需求”等问题，他的论点总是趋于保守，甚至趋于反动。

职业剽窃者

马尔萨斯是个剽窃“专家”，他的《人口原理》的基本理论，并没有什么新鲜货色，基本上是直接剽窃别人的成果堆砌而成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一书中论及马尔萨斯著作的反动作用和剽窃性质时指出：“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一本攻击法国革命和与它同时代的英国改革思想(葛德文等)的小册子。它对工人阶级的贫困进行辩解。理论是从唐森等人那里剽窃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十三章中说：“他这本书最初的版本不过是对笛福、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唐森、富兰克林、华莱士等人的小学生般肤浅的和牧师般拿腔做调的剽窃，其中没有一个他独自思考出来的命题。这本小册子所以轰动一时，完全是由党派利益引起的。”马克思还说：“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这部著作是“靠牺牲原著而剽窃成功的最明显的写作例子之一。”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首先剽窃于英国传教士和统计学家华莱士(Robert.Wallace, 1697-1771)的著作。华莱士在他的《关于上古和近代人类数目

的论争》一书中，提出了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的思想。他认为，近代各国的人口，之所以远远低于应有的数字，是由于种种原因阻碍了人口增长：一是自然的原因，如气候变化、土地贫瘠、地震等等，使人口增长受到了抑制。华莱士在研究共产主义前途问题的《纵横未来》一书中，认为共产主义社会虽然能够消灭贫困，增进人民的幸福，但这种幸福的制度将会引起人口的大量增加(即按几何级数增加)，所以共产主义社会终将以不能提供增加的大量人口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而失败。华莱士的上述观点，原封不动地被马尔萨斯照抄照搬，作为他的《人口原理》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马克思说：“马尔萨斯的理论正好建立在他用华莱士关于人类繁殖的几何级数同幻想的动植物的算术级数相对立上面。”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英国牧师唐森(Townsend Joseph, 1739-1816)的两本著作中的观点。一是唐森在《西班牙旅行记》中提出的人口增长依赖于生活资料的增长，而生活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论断。二是唐森《论济贫法》一书中关于国家对贫民不应救济的论断。唐森说：用法律来强制劳动，会引起过多的麻烦、暴力和叫嚣，而饥饿不仅是和平的、无声的和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力，会唤起最大的干

劲。在唐森看来，为了使无产阶级俯首贴耳听命于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唯一的办法就是使无产阶级永远处于贫困、饥饿状态之中，“雇佣工人应当经常挨饿”，工人阶级饥饿永久化，这是人口规律安排好了的，所以只要让人口规律发挥作用就可以了。为了生活必然有一些人要去担任社会上最卑微、最肮脏和最下贱的工作。于是，人类的幸福基金就会大大增加，比较高雅的人们解除了烦恼，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比较高贵的职务。唐森认为，这就是上帝和自然给资本主义制度所创立的和谐、优美、匀称和秩序，因此主张取消济贫法。这些论述，被马尔萨斯卑鄙可耻地进行了剽窃。所以马克思说：“马尔萨斯本来就是一个职业剽窃者。只要把他论人口的著作第一版同我以前引用过的唐森牧师的著作对比一下，就会相信，马尔萨斯不是作为具有自由创作思想的人来加工唐森的著作，而是作为盲从的剽窃者照抄和转述唐森的著作，同时没有一个地方提到唐森，隐匿了唐森的存在。”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还来源于詹姆斯·斯图亚特(SisJamesStauart, 1712 - 1780)的著作。在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一版发表之前，英国经济学家斯图亚特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中就已经详细地论述了人口问题。他认为，一切动物——包括人类——增殖的基本原理首先是生殖，其次是食物，

生殖创造新的生命，食物则维持生命的生存。动物数量的多少是存在着规律的，它要和土地提供的食物成比例。自然赋予生物很强的生殖能力，使生物数量超过它与食物之间的比例关系。这样就会发生疾病等，夺去很多生命，减少人口数量。其结果，生存下来的人又会获得更多的食物，他们的生殖能力又会增强，使人口达到以前水平。斯图亚特认为，人的生殖能力如同载有重量的弹簧，它的伸张总是与阻力的增减成反比。当食物暂时没有减少时，生殖数量会尽可能提高；如果以后食物减少，弹簧被压得过重，生殖力就会缩到零点以下，人口至少将按照超重的比例减少。另一方面，如果食物增加了，在零点的弹簧就会随着阻力的减小而伸张；人们开始吃得较好，人口随之增加，食物就会按照人口增加的比例重新变为不足。斯图亚特的这些观点实际上为马尔萨斯所利用，成为他的著作的主题。

至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每25年就会翻一番，这一点富兰克林在18世纪中期就曾提出，他认为，美国人口增加很快，大约不到25年就增加了一倍，而马尔萨斯在谈到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时，就是以美国为例。

此外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还抄袭了英国的著作家和政治家笛福(即小说《鲁宾逊漂流记》的作者)等人

的著作。

马克思把马尔萨斯称为职业的剽窃者的原因不仅是马尔萨斯在从《原理》中抄袭别人的观点，而且在几乎他所有的著作和论文中都大量存在抄袭的事实。马克思说：“他的《地租论》是一本彻底维护地主而反对产业革命资本的小册子。理论是从安德森那里剽窃来的。”“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一本维护资本家利益而反对工人，维护贵族、教会、食税者、谄媚者等等的利益而反对资本家的小册子。理论是亚·斯密那里抄袭来的。至于他自己有所发明的地方，真是可怜之至。在进一步阐述理论时，西斯蒙第又成了依据”（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1页）。

第七章 马尔萨斯的徒子徒孙

尽管马尔萨斯是极其反动的，其理论也是十分错误的，但《人口原理》发表后，其积极影响是明显的。它首先引起了1801年英国第一次进行人口普查，后来许多国家也开始关注人口普查工作。其次马尔萨斯掀起的人口理论的争论，引起社会对人口问题的关注、重视和经久不衰的研究，使人口问题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现代西方的人口理论有很大的发展，但不可否认这些理论就其基本思想来说仍然是承袭马尔萨斯的。再次它还使控制人类自身繁殖乃至计划生育成为当代众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一项重要的决策。这类政策的实际将对世界人口适度发展带来积极后果。

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人口理论基本上是沿着马尔萨斯的思想发展，经过一番妆扮，形成了各色各样的人口理论。

普雷斯主义

普雷斯主义即新马尔萨斯主义。它的基本观点和

马尔萨斯学说完全一致，都是把人口现象看作自然现象，把人口规律看作自然规律，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和罪恶归因于人口增长过快。普雷斯（Francis Place, 1771-1854）是英国的社会学家，在马尔萨斯与葛德文的争论中，他是马尔萨斯的积极支持者。1822年，他的代表作《人口原理的说明和例证》出版，这是一本积极宣传和论证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基本观点的著作。弗朗西斯·普雷斯断言，如果不抑制人口的增长，使其不超过生活资料或资本的增长，人民的生活状况就不能有重大的或长久的改善。他和马尔萨斯一样宣扬抑制人口增长，但反对马尔萨斯提出的禁欲和晚婚的“道德抑制”，主张实行避孕等人工方法来节制生育，认为这些办法是符合从属和道德原则的。这就为控制人口增长开辟了新的途径。他声称，采取这种“生理上的预防措施”，可以使一对夫妇不致生育超过他们所希望的数目的小孩，“使劳动的供给能够经常保持在对劳动的需求之下，而人口的数量能够经常保持在生活资料所能供应的水平上”。这样，不但人人都可能结婚，而且“所有阶级的文化知识和生活的舒适程度都会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国家也会在财力、实力和智慧各方面都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避孕节制生育的措施在他心目中成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失业和阶级矛盾的救世“良药”。由于

普雷斯极力宣传用避孕的方法控制人口增长，才出现了英、美等国开展大规模的节育运动。所以人们把弗朗西斯·普雷斯看作“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奠基人。

新马尔萨斯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的流行，客观上反映了它适合于为垄断资本的统治服务。垄断资产阶级利用新老马尔萨斯主义，把工人群众和殖民地人民的贫困，把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都归因于人口增长过多。所谓“生存空间”、“人口压力”，更是利用新老马尔萨斯主义为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进行辩护的典型谬论。

现代马尔萨斯主义

现代马尔萨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国家泛滥。它与马尔萨斯主义的不同在于：马尔萨斯主义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主要是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期出现的相对过剩人口进行辩护，而现代马尔萨斯主义则是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利用马尔萨斯学说为垄断资本辩护的一种反动思想体系。二战后，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和世界市场的斗争更加激烈，西方列强以更大的规模扩军备战，全世界笼罩着核战争的乌云；民族解放斗争风起云涌，殖民地

附属国纷纷独立，但由于过去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经济建设遇到许多困难，而人口又急剧增多，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动荡不安。战后，世界人口增长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发展，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每年以2%的高速度递增。这主要是由于摆脱殖民统治的亚非拉国家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生活上有所改善，从而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提高。这样亚非拉国家生产力发展缓慢、经济文化落后与人口迅速增长形成了突出的矛盾。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出版了许多宣扬马尔萨斯主义的著作，战争威胁、民族解放运动、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贫困等等，都归罪于世界人口增长过多，特别是亚非拉人口增长过多。他们吸取了现代科学知识，采用新的材料，提出了新的措施，抛弃了马尔萨斯的一些露骨的提法，更具有迷惑性。他们高喊世界面临“人口危机”。世界人口如果仍按原有的增长速度增长下去势必造成粮食饥荒，自然资源枯竭，甚至面临“世界末日”，人类毁灭。

现代马尔萨斯主义最有代表性的首推“人口爆炸论”。“人口爆炸论”首先是由赫茨勒提出的。他在《世界人口危机》中写道：“世界人口”就像氢弹爆炸一样骤然增长了若干倍，近3年来，世界人口几乎增加4倍。从此以后，人口爆炸这个词就到处风行，说什么“人口增长比原子弹还可怕”；说什么当前世

界上存在人口危机、能源危机、资源危机、粮食危机、环境危机，中心问题是“人口危机”，等等。

人口爆炸论者继续鼓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本观点，把人口增长和食物增长相对比，断言人类的繁殖比他们的食物供应增加得快。当前世界人口过剩，特别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人口过剩，是这些国家贫困、落后、饥饿、失业等一切问题的根源，并胡说“人口过剩”和“生存空间不足”就是战争的祸端。

据此，他们认为人类的“生存之路”，是要减少人口，特别是减少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即所谓的低等的阶级和种族的人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竟然公开鼓吹运用“战争、瘟疫和饥荒”等手段，消灭现存人口，甚至认为发动核战争，才有助于解决世界人口问题。福格特说：“智利民族的主要幸福之一，也许是最大幸福，就是高度死亡率”，在他看来，医生是“有严重罪行的人”，乔·斯彭斯发明的治疗疟疾的药物“也许是一种和原子弹同样危险的力量。”因为这使得“阻碍人口增长的最有效的因素开始失去作用”。这种论调十分荒谬。

与“人口爆炸论”相辅而行的就是“自然资源枯竭论”。他们认为当前世界上存在着种种危机，中心问题是“人口危机”。他们利用现代科学提供的材料，说明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迅速增长，今后世界粮食

匮乏、资源枯竭、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等等，人类将面临世界末日。以多尼拉·H·米多斯为首的罗马俱乐部，集中了许多国家的不同学科的17名专家，利用现代科学知识和计算机技术，进行专门的科学研究，出版了一本《增长的极限》的报告，作者以全球的粮食、自然资源、能源、环境等方面的材料与世界人口增长进行了比较，得出了一个难以解脱的“人类困境”的悲观结论，宣告了由于资源的耗竭和污染指数的增长，在2000年以前，人口和工业增长就会停止，整个世界由于资源危机而崩溃。福格特说：“目前人口太多了，世界上有限的资源不足以为其提供较高的生活标准”，“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资源资本’都正面临着严重的枯竭”。他认为，由于人口增加，人类滥用土地，许多土地的生产能力已经大大下降，适于耕种的土地不断减少；人口增长和土地负载能力下降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唯一的“生存之路”只有减少人口。虽然，福格特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富毁灭性的限制因素之一，“对土地来说，自由竞争和牟利动机是最大灾难”。但他仍坚持“人口决定论”，他说，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给高速增长的人吃光了，人口多资源少，“目前人类的处境就如同一个人穿着一双小了两号的鞋子。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而不要再埋怨经济制度运转不灵”。而英国社会学家泰

勒在1926年出版的《世界末日》的书中断言：人类将在最近30年内毁灭，因为地球上人口过剩了，什么都用光了，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

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引进人口质量概念，用生物遗传学来区别阶级，用种族的不同来区分优劣。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是“具有优秀遗传素质”和“高度天赋”的“富有进取心”的“高等人”，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则是“心理不健全”、“先天低劣”的“下等人”。“就是在整个人口中，在一极端，是被社会所公认的不适宜的人，例如低能的人；在另一极端，包括社会最高阶层的人。这些人具有财富和社会声望等”。因此，要避免人类遗传素质的下降，现应减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人口。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国家是优秀民族，而第三世界国家则是劣等民族，在生存空间不足的情况下应首先让优秀民族获得生存和发展。发展中国家则是靠美国来养活的，美国加重税收负担和增加公债，仅仅是为了“养活两洋彼岸的多余居民”。

现代马尔萨斯主义大肆宣扬人口增长造成地球上资源、粮食、能源等危机和环境污染，“人口爆炸”将导致人类社会前景暗淡和世界末日将要来临等等，并把这一切统统归罪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增长，公开鼓吹借助于战争来减少人口，从而消灭危机和失业，

然而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要害恰恰闭口不谈，这就是由于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统治、剥削和掠夺，造成了这些国家经济文化的长期落后。其手段和马尔萨斯如出一辙，其目的完全是为了掩盖垄断资本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掩盖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掠夺，以及其本国的失业和严重的经济问题，从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为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扩张政策服务。

在60年代喧嚣一时的“人口爆炸论”、“人口危机论”、“资源枯竭论”等现代马尔萨斯主义的理论，宣告了人类的末日。而到了70年代中叶以后，世界人口增长速度不是日益上升而是开始下降，甚至连“人口爆炸论”和“人口危机论”所依据的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率也在逐步下降。近年来世界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事实宣告了“人口爆炸论”、“人口危机论”和“自然资源枯竭论”的破产。现在人类正胜利地向21世纪迈进。

此外，在现代西方人口学说中还有所谓的“人口转变论”、“人口零增长论”和“适度人口论”等。这些理论一样，无非是想从人口的规模、水平、速度找出一个人口再生产的规律，然后对这个规律作出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解释，在本质上与马尔萨斯主义是

一致的。

马尔萨斯的门徒——凯恩斯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西方人口增长速度减缓下来了。19世纪中叶以后，死亡率降低，出生率开始显著下降。这就是所谓的人口革命的人口现象。于是西方的经济学家们担心人口资源不久是否会发生枯竭；为了经济发展，人口是否反而有增长之必要。这样就要求以强调人口动态方面的人口论来代替强调人口黑暗面的马尔萨斯理论。凯恩斯主义是这种趋势的产物。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 - 1946）虽然成长于人口缩减的时代，但长期以来他作为马尔萨斯的信徒，反复主张的都是人口过剩。凯恩斯十分推崇马尔萨斯，称马尔萨斯是“剑桥的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只要奉行马尔萨斯的理论，资本主义世界就可以完全改观。他说：“如果19世纪经济学发展的主干不是李嘉图，而是马尔萨斯，今日的世界该是怎样一个更为聪慧、更为富庶的天地啊！”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危机、失业、无产阶级贫困化等社会灾难，完全可以用马尔萨斯的理论而得到拯救，因而马尔萨斯主义应该“永存”下去。19

19年，他发表了批判凡尔赛和约的《和平的经济后果》，分析第一次大战后的欧洲经济，指出经济危机实质是过剩人口的危机。他认为在马尔萨斯时期，社会灾难的魔鬼是人口问题，而现在呢？人口可以维持在一个“稳定增长”的水平，“人口的魔鬼给控制住了，”但还没有解决失业问题，所以“失业的魔鬼从有效需求的裂缝中站了出来。”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要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过剩”问题，而凯恩斯则认为解决了“有效需求”问题，资本主义“过剩人口”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凯恩斯还在另外几篇文章中，如《曼彻斯特商业卫报》杂志的人口时评里发表的一篇文章、1930年《人口与节制生育》、《我们的孙辈时经济的可能性》，反复玩味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主张。就连当时的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凯恩斯一味固守完全没有意义的马尔萨斯过剩人口论，是极为不幸的事。

直到1930年后，凯恩斯才承认人口缩减的事实。在1930年《货币论》中，他认为欧洲的人口问题并非马尔萨斯那种过剩人口问题，而是在于人口缩减的危机。为此，他提出了有效需求的理论。这个时期凯恩斯对马尔萨斯的关心已从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转到了《政治经济学原理》。1933年撰写了马尔萨斯传记《罗伯特·马尔萨斯——剑桥最初的

经济学家》。1935年在剑桥大学主办的马尔萨斯逝世100周年纪念会上作了纪念马尔萨斯的讲演。讲演中说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相继对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贫困，另一个是失业——怀着关注的心情。年轻的马尔萨斯以其闪烁的天才说明了，失业并非由于生产力不足，而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所造成。

马尔萨斯对于使自己困惑的失业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所引起这样的问题做直观的理解，提出了生产量由有效需求所决定这个有效需求原理。但对有效需求不足到底是什么理由产生的，却不能作充分的说明。他也没有一个阐明有效需求结构的理论。把马尔萨斯这一不完全的有效需求原理最初形成理论体系的当然要算凯恩斯的《通论》。1937年凯恩斯在优生学会上做了题为《人口缩减的若干经济后果》的讲演，开始了他的所谓新人口论。凯恩斯主义的要旨是企图通过国家机构，调节资本主义经济，达到“充分就业”，以解决“消费不足”（即对个人消费品的需求不足）和“投资不足”（即对生产消费品的需求不足）来提高“有效需求”。他认为“有效需求”，如果主要是依据人口和生活水平的变动的話，那么只要人口发生缩减，在生活水平没有充分提高的条件下，就会使有效需求不足，发生慢性失业。此后，如果人口缩减进一步显著发展，这种长期停滞局面也就变得更加严重。

照凯恩斯的说法，由于人口缩减确实可能逃避马尔萨斯所谓的人口过剩的魔鬼。但是只要因人口缩减使有效需求减少，如果没有一个消费水平提高与之相抵，这一来就又要发现另一个叫做失业的魔鬼。这个魔鬼也可以叫它为马尔萨斯的魔鬼。年轻的马尔萨斯从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低下出发，在他的《人口原理》中放出来一个叫做过剩人口的魔鬼，但到了后来，马尔萨斯为了说明失业的发生，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失业的魔鬼。于是凯恩斯下了一个这样的结论：如今马尔萨斯的过剩人口魔鬼被链子锁了起来，马尔萨斯的失业的魔鬼又要切断锁链逃出来。人口魔鬼被锁了起来，我们虽然解除了一个威胁，但又由于资源不充分利用，我们受到另一个失业魔鬼的威胁，更是较前有增无减。

凯恩斯的前后期思想都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和经济学理论有紧密的联系。凯恩斯企图通过他所杜撰出来的“充分就业”、“有效需求”等理论，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其实质不过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在20世纪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翻版。